

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專輯

本屆研討會係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卅日在臺北揭幕，四月一日結束，中

日兩國與會的專家學者八十餘人，曾以「當前中共對內對外策略的轉變」

為主題，在會中提出有關論文九篇，並從事認真而熱烈的討論。本刊特選

出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四篇，連同開幕閉幕致詞五篇，刊為專輯，俾供讀者

參考。——編者。

開幕詞 (一)

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主任 蔡維屏

各位貴賓，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在這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的時候，本人謹代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向到會的各位學者專家，特別是自國外遠道而來的，表示誠摯的歡迎；對於今天上午參加大會開幕典禮的貴賓，表示萬分的感謝。承蒙張秘書長和船田中先生代表北澤直吉先生親臨致詞，給予大會莫大光榮，尤為吾人感奮無已。

一年來，中國大陸發生劇烈的變化，嚴重的加深了中共政權內在的危機，也影響了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定，所以這一屆大會以「當前中共對內對外策略的轉變」為主題，至為恰當。深信各位提供的資料和商討的結論，定可作為自由世界朝野人士立論和決策的參考。

本人想藉這個機會，特別就中共最近對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海外僑胞所發動的統戰，略陳所見，以供參考。中共在最近的笑臉攻勢中，揚言要與我通郵、通航、通商，並表示要與我談判，以達成和平統一。

首先，國家的統一，是任何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但是人所共知的，中華民國和今天中國大陸上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人民生活樣樣都是截然不同的。要統一的話，不是我們接受共產暴政，便是要中共排除馬列主義，廢棄共產獨裁。中共顯然無意如此做法，那麼，他們高唱統一，便是一種統戰伎倆，想以此動搖我民心士氣，來達成他們無法以武力來完成的奪取臺灣的目的。

事實上，不僅在臺澎金馬的中國人民不願意放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願意接受中共的暴政，即是現在大陸的同胞也已經公然的表示要推翻人民公社，爭取人權。從國際輿論來看，在上年十一月八日，早在中共發動笑臉攻勢之前，亞洲華爾街日報便有專文指出：中共要實行現代化，不祇需要和中華民國一樣，要具備人才、技術和資本，尤其是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出發點，保障人權，充裕日用必需品的供應，以提高農工大眾的工作情緒。該報又在本年三月十四日著論，大字標題：要現代化，大陸就應該「臺灣化」，樣樣向臺灣學習。除此之外，持這樣看法的外國學者專家甚多，不及一一列舉。

所以我們要警告中共的頭頭們，如果要向臺灣學習，不能祇顧表面——向外貸款，派留學生出國吸收技術——還需要澈頭澈尾的放棄這卅年來證明已經完全失敗的共產制度。他們應該順應國際輿情和國內人民的呼聲，把今天大陸上的互相監視的牢籠，變成自由開放的天地，把落後的赤貧公社，改建為現代的均富社會。

第二、說到和談，有一些外國人士認為不妨一試。他們以為雖然不會有結果，但是，在對抗中共的統戰中，我們不至於處於被動，居於下風。

在這裏，我們無須詳述在我們與中共長期對抗中所受的痛苦經驗。以往中共發動的和談，不是用來作掩護，以獲取時間空間，壯大自己，便是用來作欺騙，以破壞我方的團結。我們放眼戰後世界各地的共黨作亂，試問有無經由與共黨談判而獲得成功的任何先例？

這一次中共發動和平攻勢，是緊隨着它與美國建交之後。美國已經承認中共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那麼，這樣的談判，一經我方承諾，便很容易被中共曲解為是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商談自治條件的談判，那便是說，我們同意和他們談投降的條件了。

國外許多富有正義感的報章雜誌都曾指出，中共所建議的和談，看起來句句甜言蜜語，可是如果中華民國接受的話，便要扯下國旗，廢棄國號，丟掉它的國際人格，這種和談的倡議，事實上就是招降。

記得在徐蚌會戰之後，中共與我政府，分據長江南北；中共當時也曾發動和談攻勢。但在李代總統宗仁所派的和談代表團抵達北平之後，中共所提出的第一個和談條件，便是要我政府交出「戰犯」——所有我最高黨政軍領袖都包括在內。由於這個教訓

，我們要正告國際人士，和土匪流氓打交道，實無異於和毒蛇猛獸擁抱，其危險的程度，不是常人所可意料得到的。

第三、說到通郵，中華民國憲法賦予人民通信自由。但在今天的大陸，收信寄信皆經檢查，人民對國外寫信更要接受指導。平時中華民國人民若與其在大陸親友通信，許多人在很久以後輾轉收到自香港南洋或美國帶來口信，叮囑寄信人以後最好少通信，以免引起中共的查問和糾纏。現在如果我同意通郵，便等於提供中共許多難以尋找的資料——讓他們獲知大陸有那些人還是臺灣地區人民的情感包袱，那麼，中共當局便可無盡止的加以利用。

其次，中共要想向中華民國滲透，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任何中共的宣傳品郵寄來臺，是被禁止的，所以他們無計可施。如果我與大陸之間開放通郵，中共可以透過它的組織，指使成千上萬的大陸同胞，日以繼夜的寄出大量的函件和宣傳品，家書中夾暗語，信件內附宣傳品，花樣不一而足。

第四、說到通商通航，更是澈頭澈尾的統戰伎倆。試問，今天大陸一般人民吃飯要糧票，出外要路條，教育受限制，工作無自由，一切物質無不在中共控制之下，依照政治目標而加以運用，中國大陸那裏有行動的自由？又那裏有貿易的自由？假如中共要想用這些來騙大陸同胞，誰也不會相信，我們當然更不應該幼稚到相信它的謊言。譬如，正當中共高唱現代化的時候，正當中共的報章、廣播整天報導：中國大陸抓綱治國，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以及十年規劃和四個現代化，至兩千年便可以趕上已開發國家的時候，逃往香港的人數，反而日見增加，而去年一年逃亡香港的難民，更打破了多年以來的紀錄。難民們到了香港後都對親友們說，中共的那一套聽多了，現在已經不管用。甚至有些難民說，中共愈宣傳遠景美好，愈使他們覺得更可怕的景況就要來臨。

這許多都是各位所熟知的，今天特別一提的主要目的是，我們不與中共談判，就好比不願和一個滿身污臭的浪徒站攏。如果有些人士認為這種做法，可能給人一種印象：中華民國在這一輪統戰中是失敗了。那麼我便要提醒他們，在許多實地的抗爭裏，我們每一輪都勝過了中共，諸如土地改革，經濟建設，奠定憲政基礎，實施民主政治，保障人權，充裕民生等等，在任何一方面中華民國都打敗了中共，使他們站不起來。如果今天中共頭頭們的頭腦稍為清醒一點，能為億萬同胞的幸福着想，便應及早使大陸「臺灣化」，向三民主義歸隊。

各位貴賓，各位代表，這一次大會議程的安排，有許多地方是採納上年第六屆大會的安排而改進的，相信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在會議以後，我們安排了參觀和拜會的節目，如果在接待方面有不週到的地方，還請原諒。最後，祝會議成功，各位身心愉快。

二、開幕詞 (二)

日本代表團
長 桑原壽一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先生：

首先允許我在此蒞臨開幕典禮的各位先生表示我的敬意。同時向此次招待我們一行卅四人參加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蔡維屏博士深致謝意。同時對籌備此次會議極為辛勞的各位先生及在東京爲我們照料的張棟材先生表示衷心的感激。

當我在此致詞時，不禁使我想起前年參加第五屆大會時在此所說的一段話：大意是說回顧自一九七一年召開第一屆會議以來的經過情形，貴國方面對歷屆會議均能準備週到，使會議順利舉行；但是在我們日本方面却有兩次每隔一年必呈現一種步驟零亂的現象，因此我們實在深感慚愧。當時我曾說明日本方面所以會如此的原因，並非吾人對會議態度的消極，而是我們在日本所處環境條件所使然。

事實上，在我們召開第一屆至第三屆會議期間內，就是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之間，如果當時在日本有人對中共提出批評性的言論，乃是觸犯禁忌的行爲。倘若有人竟敢發出正義之聲，幾乎必被指爲是叛逆。

幸而，像上述的日本環境條件，已逐漸發生了變化，今天不祇每人可以毫無顧忌的表達其意見，而且可以展開真正是屬於正義的正確言論。坦白的說，雖然這種變化是緩慢的，在貴國看來或許是令人難以忍耐，甚至亦難免有不甚滿意的感覺。不過，若以我們在日本親身體驗到的這種逐漸變化的感受而言，已經覺得是非常難能可貴了，因爲這確實是一種追隨歷史踪跡的感受。

問題在何以會促成這種變化的實現呢？無疑的，這是由於中共在大陸上所抱的幻想一一自行幻滅所致。像毛澤東偶像的墜地、過去被指爲最壞的人，今天却變成「革命」的功臣；又如那種永無止境的政治混亂、陷於絕望的經濟癱瘓、永遠陷於饑荒狀況以及國土和人心流於荒廢等等情況就是例證。正如貴國行政院孫院長所指出：「中國大陸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均富社會，乃是一個落後的均貧公社」，孫院長所作的評斷，真是一言中的。

今天中共已面臨了上述現實情況，使一向在日本論壇上昂首闊步讚美中共論調的人士和一些所謂「前進的文化人」，有的已是三緘其口、有的故意裝聾作啞、有的已經變節、有的仍在玩弄詭辯，完全陷於一片混亂狀態，因此我將日本今日一般情況，作如上的闡述，並不爲過。

其所以招致了上述決定性結果的原因，無疑是由於中共與越南的戰爭所致。在共產主義國家之間，應該講求「和平勢力」的

，但是，使人難以相信的，彼等竟以互相殘殺無辜人數多寡來作競賽，今日在這種現實的面前，令人愕然的並非別人而是他們自己。這些給予今天日本思想界的影響，是無法衡量的。因為它已經充分證實中共的詭詐性，原來一向兜售反對霸權的中共，竟然亦會伺機一變成爲霸權者。試想還有什麼教材會比這些對認識中共更有說服力呢？

如上所述，由於中共這種以大制小，所顯示的道德頹廢行爲，在中國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和預示了什麼，相信只有今天與會的貴國各位代表們才能體會得到的。各國對中（共）越戰爭的論斷，幾乎完全是將其主要原因歸究於外在的條件上，而唯有貴國却發現了更多的內發性的因素，我相信它所以能被接受，也即是基於重視這種事實所致，但不知我的見解是否正確？

基於上述原因，相信凡是任何對外行動，與內部情勢絕對不會沒有關係，也不會是孤立事件。因此，我們先要探究迫使中共走向中（共）越戰爭的內部因素是什麼，然後才能具體掌握中共領導階層及社會基層動亂的真實方向和情勢。關於這一點，也是我們日本代表們期待於本次會議中的重要項目之一。

在第七屆會議揭幕的今天，本人願意在此提出個人的一點感想。我覺得我們每屆的會議，很奇怪的，似乎都配合了中共發生大混亂的步調而召開的。回憶舉行第四屆會議時，中共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特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件事情，簡直是顯示了中共的動盪與混亂成了常例。這次第七屆會議的揭幕，似乎也不例外。即使拋開已經發生的中（共）越戰爭不談，在中共內部，正遭遇着華鄧政權對推行現代化政策及民主化路線的矛盾與挫折，也即是它正遭受着嚴厲的老驗。

現在已經有人在嚴格追究由「一個沖昏了頭腦的長官和數名高官」所作出的獨斷經濟政策和發生破綻的責任，更有人在檢舉將「幹部和幹部職位作爲私有財產」的「官長」和它產生的山頭主義和派系對峙的事實。究竟它所指的一個長官是誰呢？所指的數名高官又是那一派呢？今天中共的權力鬭爭已經變成漫性化，雖然這些已非怪事，但在三中全會剛才決定了新領導幹部後正在起步之際，却發生了上述情勢，決非尋常。

衆所周知，在中共上層部門已發生動搖，一方面在社會上又相繼發生像上海等地的下放知識青年的抗議運動和暴動事件。如果這些抗暴活動發展成像天安門事件時，即顯示了人心的趨向，也代表了社會的動向；申言之，如果將這些事件視爲與「天安門事件」相匹敵的「上海事件」而加以評估時，則暗示出它在將來會發生比上層領導集團的權力鬭爭更重要的事情，那又將是什麼呢？

總而言之，今天在中國大陸是處於上下一片混亂的局面。正在此時，恰巧我們又在此地舉行本次的會議，相信這決不是單純和偶然的事。

本席謹以上述散漫的言辭作爲開幕致詞，感到非常失禮。最後，我們全體日本的代表，必然會給各位帶來許多的困擾，我謹代表他們在此先向各位先生致歉，並且敬祝各位先生健康愉快，謝謝。

三、開幕賀詞

日本國衆
議院議員 船田中

主席、各位貴賓，出席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各位學者、專家：今天，當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之時，本人有機會致賀詞，感覺非常的榮幸。本人，首先要向主辦這次研討會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蔡維屏博士，以及各位執事先生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

當本人在這裏講話的時候，忽然在腦海裏想起了這次致詞已經是自一九七四年第三屆研討會以來的第五次致詞。在這一段時間裏，貴國所處的國際情勢是非常險惡而且變化多端。但儘管如此，本研討會却能够克服各種困難，繼續維持下來。本人亦能參與其事，並有機會連續五次在本研討會上致詞，表達一些意見，這在本人較長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一頁不可磨滅的光榮記錄。雖然說「志在千里」，但是對於已步入垂暮之年的一個政治家來說，不能不引發一種特別感慨。在這裏，本人要再度表達深深的謝意。

毋可諱言，近年來的國際情勢之演變，對貴國而論，不一定是走在好的方向。本人感覺十分遺憾的是，日本對這種情勢的出現，不能不擔負一點責任。對日本而言，這也可以說是爲其歷史蒙上了污點。雖然如此，當前最重要的，是暫且把這些過去的事擱置下來，而積極地來尋找能因禍得福的有效途徑。

當我們正在摸索應該做什麼事的時候，蔣經國總統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晨間二點所發表的聲明，爲我們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啓示。蔣總統在該聲明中，闡明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出現，決不能經由一時的「權宜之計」，同時向國內外聲明中華民國將忠實地履行其所負的國際責任。最後，他還堅決表示絕不與中共政權，以及任何共產國家談判和妥協的堅定信念。這真正是一篇劃時代的嚴正聲明。蔣總統在這裏指出了我們應該遵循的共同的大原則。

最近在亞洲所發生的一連串動亂，澈底地證明了蔣總統所指出的建立在「權宜之計」上面的國際關係之虛偽性。例如在有益於亞洲安定與和平之假設上所完成的「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和「美中（共）建交」，却引發了越南對高棉的進攻、中共對越南的侵略，以及蘇聯的不穩動態等等。如果走錯一步就可能發展成爲世界大戰。這一連串的事實和經驗告訴我們，自由民主陣營應該堅持自由民主的立場。蔣總統所指國際責任，應是指此而言。本人對其卓見，深表敬佩。

目前在亞洲的動亂中所表現出來的共產主義者相互間的「兄弟鬩牆」之鬭爭局面，是值得注視的。以往由一部份人士所高唱

的所謂「帝國主義戰爭論」，如今已轉變為「社會主義戰爭論」。這一轉變中存在着許多應該加以探討的重要問題。就這一角度而言，這次的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可以說較以往歷屆研討會更具有特殊意義，所以特別要預祝會議的成功。本人提出上述一些意見作為向這次研討會的賀詞。最後，敬祝各位先生的健康，以及事業的更加發展。謝謝各位！

四、開幕致詞

中國國民黨中
委會秘書長 張寶樹

主席、桑原團長、各位代表先生：

第七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今天在臺北舉行，欣見此一會議每年都能定期召開，影響日漸擴大，對於中日兩國有關人士的辛勤策劃，努力推動，本人至感欽佩。今天承邀在開幕典禮中致詞，覺得十分榮幸。首先在此要對日方的各位代表先生敬致歡迎之忱。

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主旨，在於提供一項機會，使得中日兩國的學者專家們共聚一堂，交換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心得與資料，並藉客觀的研討，對中共政權作合理的評估，從而擴大中日兩國民間的友好合作與文化交流。多年以來，經過不斷的集會，此一會議有形的收穫，固然日漸豐碩，而更重要的是，與會人員均能在會後，就互相交換得來的研究資料與討論意見，不斷的透過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發表評論，導引兩國民眾正確瞭解中共政權的真實面目，影響深遠，貢獻良多。

中日兩國的關係應屬唇齒相依，密不可分。不幸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中日邦交中斷。兩國的有心之士都曾痛切的反省檢討，大家有感於中日兩國「合則同蒙其利，分則同受其害」的要義，立即採取了若干積極性的措施，以圖補救，因此在斷交後的這段期間，形式上的外交關係雖不存在，但實質上的友好合作却日有增進。

去年年底美國終不能免於為中共所誘與之建交。這對中華民國而言，固然構成了極大的傷害，但對亞太地區各國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也是難以評估的。中美斷交，協防條約也將至本年年底失效，對於一個長期友好的盟邦，美國竟背信忘義至此，足證其條約承諾已不足恃。加以美國採取「聯匪制俄」政策，逐漸退出亞太地區，使此一地區原有之均勢已為之破壞。蘇俄軍力東移南下，機艦頻頻出入對馬海峽，復在日本北方島嶼擴建軍事基地，構成對此一地區中日韓三國的嚴重威脅。中共與越共之戰，益顯共黨黷武好戰的本質。處於此一共黨擴張爭霸，危機重重的情勢下，亞太地區國家，尤其是中日韓三國除了「自助互助，自保互

保」外，實已別無他途可尋。此端賴各國有關人士，正視此一問題之嚴重性與迫切需要，奔走疾呼，喚起政府與民衆的正確認識，採取積極有效措施，以進一步維護國家安全與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定。

今日的中共政權，仍在企圖藉與外國建交，以及動輒窮兵黷武，虛張聲勢，來掩飾並轉移其內部無法克服的重重危機。其與美建交，與對越用兵，正是此一手法的事實表現。殊未料到與美建交非僅未達到其提高國際聲望與孤立中華民國，瓦解我國民心士氣的願望，反而激起了中華民國海內外團結自強，美國各界支持中華民國，反對中共的行動。中共對越共之戰，原本揚言要給越共一個教訓。未料一開始就陷入泥沼，進退兩難，落得草草收場。這兩項對外行動，如今在中國大陸上已引發了政策路線之爭，埋下了另一項權力鬭爭的導火線。

再說中共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中共政權編造的一幅虛幻遠景，目的無非在壓抑人民的不滿情緒，苟延中共的統治權位。然而據國際間客觀的分析，由於中共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的阻礙，有關償債資金的籌措，新技術的引進，技術人員的缺乏等等困難重重，想在十年內達到目標，實屬幻想。而中共的領導班子，顯然又對其政治生命，繫於「四個現代化」的能否達成，所以其未來命運，實甚悲觀。

中共的另一項危機來自大陸下放青年，共黨的新老幹部和農工羣衆。從去年年底開始，大批的下放青年不堪長期虐待、饑餓，紛紛回到城市，向中共當局要自由、要糧食、要求就業，因此各地搶糧、暴動，層出不窮，人數之多與範圍之廣，亦爲以往所未見，目前此一情勢仍在繼續蔓延擴大之中。其次「四人幫」的徒衆雖遭批鬥，仍在伺機反撲，新獲平反的幹部滿腔怨憤無處發洩，農工羣衆不滿剝削，正以消極怠工表示反抗，這些現象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徵兆，一次更大的暴亂，也許不久將一觸即發，這是中共政權至始就無法解開的死結，終將導致其全面瓦解、崩潰。

中共自從與美建交之後，隨即在國際間對中華民國加強統戰，妄稱要與臺灣自由通航、通商、通郵，而中華民國也曾不只一次的嚴正宣告，堅持不與中共談判接觸的鮮明立場，這正是中華民國掌握主動，制敵機先的攻勢作法，中華民國將堅守民主陣容，善盡國際責任，也絕對不會辜負民主國家和大陸八億人民對我國深切的期望與付託。

未來，顯而易見的中共仍將運用其中國大陸市場的假象，加強施展其國際統戰。然而依據可靠資料，去年一年中共進出口貿易總額不過一百九十二億美元，且其中多半係進口糧食所致，而中華民國爲二百三十七億美元，比中共多出四十五億，如按人口平均分佔，我國爲一千三百九十四美元，中國大陸人民只有二十一美元，我國爲其六十五倍。再說外匯存底，中共目前尚不足二十億美元，今後「四個現代化」所需要的龐大資金，以及進口糧食的鉅額外匯，即使能乞靈於外債的支援，但如何償付？加以在共產制度下，人民消費受到限制，沒有購買的能力與自由，民主國家實不應對大陸市場寄予期望。最近，中共爲事實所迫，不得不宣告毀約，不再履行其自日進口煉鋼設備的二十餘億美元合同，本月初又中止了與三家日本公司進行的進口總值五億美元三座

水泥廠的談判。今日熱衷向中共提供貸款，或合資建廠，促進貿易者，亟應對此慎加評估，以免得不償失。

各位代表先生：中日兩國，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在防衛上都屬密不可分，本次參加大會的代表，均係碩彥之士，希望會議結束後能以此次大會的共同結論，透過學術輿論界及各種關係，廣為闡述，加深兩國各界對中共政權本質及其陰謀企圖之正確認識，進而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合作，則未來中日兩國必將同蒙其利。謹在此

敬 祝

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代表先生身心愉快。

五、閉幕詞

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主任 蔡維屏

各位貴賓，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在這短短三天的會議中，我們以「當前中共對內對外策略的轉變」為核心，討論了中共的內政、外交以及八十年代的亞洲情勢等等問題，各位學者所提供的資料和意見至為精闢。有些位是從全局來觀察，有些是就專題作深入的檢討，在分組討論和綜合討論裡，發言者一共有一百三十四人次，有相同的意見，也有不同的意見，堪稱百家齊鳴。最近亞洲華爾街日報說，中共想推行現代化，應該向臺灣學習，其實中共該向我們學習的，恐怕不止於經濟建設而已。

關於中共內部問題，與會學者認為鄧派勢力獲得暫時優勢，並未獲得壓倒性勝利，鄧的路線也未獲得完全的支持。有的學者指出，中共現時沒有毛、周那樣的領導者，也沒有新的理論可以取代業已殘破的毛思想。舊的體系已經動搖，新的核心未曾建立，鄧小平對內躁進、對外冒險，極容易招致批評與反對，中共前途仍然像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所說，左派要奪取政權，右派又要奪得政權，權力鬭爭將有增無已，中共的幹部政策業已崩潰，更值得重視的是工農大眾和知識青年的不滿與覺醒是中共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天安門事件、上海事件所代表的意義尤不容忽視。

中共沒有它自己所強調的「安定團結」，現代化就談何容易！學者們引證事實、列舉數字，指出中共目標過高而基礎太低，「三中全會」剛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問題上，跟着就縮小十年計劃的規模，其實實際困難不問可知。學者們在討論中獲致一個統一觀點，即「四個現代化的基礎在農業，關鍵在科技。」。

中共雖已着手先發展農業，但它的農業還停留在靠天吃飯的階段，集體化的制度既不能改，政治上的干擾，政策上的分歧，摧毀了農民的生產情緒，也扼殺了農業發展的生機。農業落後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依靠農業生產積累建設資金，那是緣木求魚。

與會學者也同意，中共已將科技現代化視爲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但一般科技較西方落後廿到廿五年，目前在科技上的措施，處處仍舊顯示膚淺與短視，忽略科學的基礎建設與發展層次。培植人才既急功近利，科技目標的選擇上，又宣傳重於實用。此外，中共一方面反蘇，一方面沿用效能薄弱的蘇聯科技制度；在使用現代科技整合方法時，配以舊觀念的設計管理。在國防科技上雖稍有收穫，但也祇是不惜成本在溫室裏刻意培植的花朵。尖端技術與初級技術之間，缺少必需的中間技術，必將成爲發展科技的瓶頸而不易突破。

今天（四月一日）大陸人民日報社論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爲四個現代化打基礎，這說明了目前四個現代化的基礎尚未建立。那麼，現代化何時起步，還無眉目，現代化的完成更是遙遙無期了。

關於中共的對外路線，目前係以反霸即反蘇爲總綱，爲反蘇而由以第三世界爲主力軍，轉變爲拉攏第二世界中的日本和西歐以及第一世界中的美國。由於中共已處於蘇聯戰略部署的三面包圍中，亟思拉攏美、日，鄧小平且有意渲染美、日、中共在攬北約組織性質的三角同盟，造成表面上對蘇聯反包圍的形勢。這自然引起蘇聯的反擊。中共和日本簽訂「和約」，蘇聯即以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回報；中共與美國建交，也加速了越南進侵高棉；中共進攻越南，又把蘇聯的力量進一步引入中南半島。蘇聯海軍之取得越南金蘭灣和峴港，受威脅的就不止是中共，勢將影響到八十年代的亞洲情勢。不少學者主張中、日、韓應加緊聯繫，籌劃自己的戰略設計，而不再唯美國是依。有的學者進一步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區像亞洲這樣，大陸是共黨國家、海島是自由世界，截然劃分得清清楚楚，因而建議中、日、韓應有聯合的集體安全保障，透過海洋上的活動保障各方安全，那會使東協國家不必再採中立不結盟路線，這個安全體系，可以使亞洲自由國家，不虞石油來源中斷，並可維持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

這種看法在第三屆關野英夫教授和第五屆井上茂信先生的論文裏都曾提出。本屆會議裡川島弘三先生的論文也有詳細的建議，學者們踴躍發言可以說是與會專家學者共同的想法。希望今後吾人能進一步對如何加強中、日、韓三國間的合作，以促進亞太地區安定和平與繁榮，研議具體辦法，以供三國政府的參考。

如何對待中共，也許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不過，多數學者認爲中共確實在變，但它的變是由於內部鬥爭和外在威脅所促成，因而只是戰略和策略的變，絕不是本質的變。對內不會變成民主制度，對外不會擔當一個和平角色，它甚至不會變得比蘇聯更好些。鄧小平的急於現代化已遭挫折，對越南用兵未達成任何目的，只在四週結怨樹敵，就地緣政治言是極不聰明的。內外挫敗可能引發另一場權力鬥爭，其結果可能是對他不利的。

總結本屆大會，大家一致承認中共在變，但不是本質的變，其變也並未定型，甚至它與蘇聯作有條件有限度的緩和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抹殺。自由世界過熱的期望，過多的介入，都是值得慎重考慮的。過分強調中共能吸住蘇聯的兵力，是西方人的觀念。對亞洲國家言，蘇聯增兵遠東，只會使我們同受威脅。因此，重視亞洲自由國家的聯合自保，不依賴西方，不寄望敵方——這一項的共同認識，應該是本屆大會的重大收穫之一。

本屆大會至此結束，謝謝各位對大會的寶貴貢獻，祝各位在學術研究工作上繼續的成功。對於來自日本和香港的各位先生、各位夫人，本人代表全體出席會議的國內學者，祝各位旅途快樂，願來年相聚時，看到大陸上八億中國人，已能重獲自由，亞太地區的持久和平終於來臨。

中共問題論集

郭華倫著

本中心副主任郭華倫教授，以其近年來撰寫之論文、報告、評論等計十五篇，彙集成冊，內容歸納為三個單元。其一為中共黨史問題，除考證中共「一大」若干問題外，着重於中共演變之論析。其二為中共問題之重點，討論毛澤東之軍事思想、繼承人與領導制度諸問題。其三為研究中共方法之探討等。二十四開本，計一七一頁，平裝一冊，實售新臺幣四十元。（美金一元二角）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郵撥：三四三六號

中共的新路線

姚孟軒

——從毛澤東路線到鄧小平路線的轉變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政變到現在，中共政治情勢的基本特徵，是在亂中求變，企圖以變止亂。這兩年多來的變，可歸結為權力結構、政策路線兩個方面，而這兩方面的變，都同北平統治階層的內訌與權力消長有密切關連，並以鄧小平復出及重振權勢為界限，分為兩個階段。就政策路線的轉變而言，前一階段，即是在華國鋒、葉劍英掌握實權的時期，僅限於對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路線、政策及其理論基礎（不斷革命論）作局部修改，刪除其極左部份，使其具有彈性，這就是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一「十一大」路線。但「十一大」路線並未維持多久，到後一階段，即鄧小平掌握實權以後，又將之作大幅度修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更由中共三中全會制定新路線，用以取代「十一大」路線，並對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和文革路線作劇烈改變。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除為了解除黑魯曉夫式宮廷政變、匈牙利式反共革命這兩大現實威脅，還想由此覓取可行途徑，防制黨內與社會上反對勢力的再起，使中共政權能以長治久安。毛基於這一需要倡導不斷革命論，但在他生前，未能為不斷革命論創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只提出它的三個主要論點：（一）由於新老資產階級的聯合反抗，及外來敵人的滲透顛覆，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這個時期長達幾十年以至一百年以上），都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因而必須不斷革命，實行全面專政，鎮壓資產階級，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二）社會主義社會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是因為資產階級法權，即殘存的私有制度，刺激人們追求發家致富，也是因為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因而必須限制、改造這些消極因素，防止新生資產階級份子的出現，並在其出現時及時識別，施以打擊。（三）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外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從而將鬥爭由黨外延伸到黨內，並將走資派視作主要打擊對象。這就把階級鬥爭與暴力統治長期化、全面化和絕對化。

毛澤東依據這一理論所設計的文革路線，其主要目標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用來防範及壓制原有和新生的敵對勢力，掃除革命進程中的各種障礙與越軌傾向，以穩固統治，保證一切施政都能依循社會主義道路向前推展。他把革命和政治放在首要位置，經濟、教育及其他業務放在次要與從屬地位，經濟、教育及其他業務，必須服從革命和政治的需要，不能違背革命和政治的利益。

在經濟方面，他強調以革命化統帥現代化，遏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使經濟發展不致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並以政治方法解決經濟問題，以革命為動力促進生產建設，排斥物質鼓勵等經濟方法。在教育方面，他將改造思想擺在傳授知識的上面，作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強調先紅後專。

毛澤東並非不重視經濟與教育，然而，政治掛帥的極左路線，却使經濟和教育受到嚴重的傷害。另一嚴重後果是：拿共黨傳統戰略尺度衡量，這種理論及路線，非僅把打擊面無限擴大，忽略爭取同盟軍，即連作為統治核心的黨，事實上也成了專政對象。除了極少數左派，已沒有什麼力量可以信任和依靠，將中共帶進幾乎是與全民為敵的不利處境。是以當毛死亡，四人幫垮臺後，北平的新領導必須有所改變。

華國鋒對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只作了三點修改：（一）肯定毛階級鬥爭長期性的理論，但認為要戰勝敵人，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除了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而鬥爭要講求策略，要根據社會主義時期各個發展階段的特殊性，確定打擊重點，集中力量向這個方面進攻，不能四面出擊，樹敵過眾。因之，只能提加強專政，不能提全面專政。（二）認為資產階級法權，不僅是產生新資產階級份子的消極因素，也是刺激生產與工作情緒的積極因素，對前者固然應該加以限制，但對後者也應加利用，不可顧此失彼。（三）不承認黨內有資產階級，只承認黨內有走資派，而黨內走資派人數很少，又多半能够教育改造，不足以構成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從而將階級鬥爭的主要打擊目標，又由黨內轉移到黨外。

華國鋒這三點修改，只是改變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全面化與絕對化的某些極左論斷，對毛的階級鬥爭長期化的理論，則完全承繼下來。華又採納「多綱論」，即除開階級鬥爭這個「綱」，還可以有其他的「綱」，根據這種理論策定的「十一大」路線，乃將加強專政、穩固統治，同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並列為兩大目標，把政治與經濟、革命與建設，置諸同等重要的地位。革命化統帥現代化，改變為革命化與現代化統籌兼顧；對解決經濟問題，也由專用政治方法，改為同時使用政治和經濟兩種方法，採用適度物質鼓勵，作為輔助精神鼓勵，刺激經濟發展的手段。教育方面，重視知識的傳授，將毛澤東的先紅後專修改為紅專並重。

新路線的理論基礎

「十一大」路線雖容納不少鄧小平的意見，但仍未為鄧所完全接受，而蓄意再加以修改。北平宣佈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解釋，要以華國鋒的言論為標準，由華充當毛思想的發言人。可是，在華替不斷革命論定下新基調以後，中共報刊陸續刊登不少文章，跟華國鋒唱反調。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華、鄧二人對涉及理論和路線的幾個重要問題，公開發生爭執。在這不

久，鄧小平拋出唯實踐論，他的同夥更提出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共產黨人慣於以實踐為理由，修改前輩宗師的理論。不過，包括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在內，從來沒有人把實踐提得這麼高，這種提法，正如反對者所批評的，犯了抹煞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的錯誤。鄧小平一伙口中的實踐，指的是他們對解決當前理論及路線問題，主要是四個現代化問題的看法與主張。他們提倡拿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際上是要依據他們的價值觀，對毛思想及毛路線重作評價，也對華國鋒的折衷主義理論與路線重作評價。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和文革路線，幾乎被全盤否定；華的新不斷革命論與「十一大」路線，也遭受重大修改。

然而，批判這兩個不斷革命論，並不表示鄧小平一幫人不要革命，只是要用他們的革命論，來代替毛澤東、華國鋒的革命論。他們也認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也主張強化專政，憑仗暴力鎮壓一切反抗，以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他們又認為，(一)大規模暴風雨式的羣衆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敵人從什麼範圍跳出來，就在什麼範圍內加以鎮壓，不能搞擴大化。(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大量是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類矛盾，就在工農、小生產者、知識份子問題及思想問題，只能用批評、教育、改造的方法。(三)鞏固政權與社會主義制度，主要靠增強國力，而不是靠階級鬥爭，因之，背離及破壞增強國力的階級鬥爭應該禁止。他們也承認，有新生資產階級份子，並將「那些新產生的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危害社會主義建設，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侵吞社會財富，觸犯刑律的份子」，皆歸屬於這一類敵人。但是，他們不承認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新資產階級份子的因素，反對加以限制。

這些改變，否定階級鬥爭的全面性和絕對性，雖然肯定階級鬥爭的長期性，但已加上若干限制，由着重「武器的批評」，改為着重使用「批評的武器」。這也就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論。鄧小平一派也反對「多綱論」，並按照他們的意見另立新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新路線，把經濟與建設改放在政治與革命之上，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其主要目標。鄧小平一幫也主張政治掛帥，不過，政治掛帥包含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經濟及其他業務服從政治需要、採取政治方法解決經濟等一切問題三項內容，他們只留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一項，否決掉其餘兩項。新路線規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黨的全部工作包括政治工作，都要圍繞並服務於這一中心工作，不再搞損害現代化建設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其用意是在不違背社會主義方向的原則下放寬政治與經濟限制，以推動經濟發展，為穩固統治建立強大的物質基礎，這就變成以現代化統帥革命化，變成以經濟方法解決經濟問題，並重視物質鼓勵。教育方面，也變成先專後紅，以發展科學技術、培養專門人才為首要任務。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除保留住基本方向未遭變更，其他部份已被鄧小平整個顛倒過來。三中全會制定的這個新路線，實質上就是鄧小平路線。

一九七八年二至三月召開的「五屆人大」，已依循「十一大」路線，為四個現代化擬就中程和長程兩個規劃要點，並置重點於突破農業這個最大的經濟瓶頸，及加速發展基礎工業。三中全會的新路線，尚未發現對此有何更改；但在實現這兩個規劃的方針與政策方面，則對「十一大」路線有重大補充及修改。中共的很多決定，如工業三十條、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加快農業發

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等，都還是草案，要等試辦結束後才能修正定稿，而北平首腦部對很多問題仍然有爭執，即連鄧小平一幫人中，也有不同意見。新路線各項具體政策尚未完全確定，不過，其架構已大致形成，我們仍能據以對新路線作進一步探索。

新路線的各項政策

新路線強調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是加速經濟發展的兩個必備條件。三中全會以後，以及全會前鄧派主張已佔優勢的一段時間，他們就本此認識，為加速經濟發展準備條件。按經濟規律辦事，主要是吸取西方企業管理的經驗，也吸取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的成功經驗，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及經營管理方法。工業方面，在加強計劃管理下下放權力，讓地方與企業有相當自主權；加重廠長與工程技術人員職權，讓工人參與工廠管理，但必須遵從黨組織領導；捨棄以前「大而全」、「小而全」的方針，依專業化協作的原則改組工業，並逐步擴大協作規模；企業經營遵守價值規律，並採取利潤提成辦法，鼓勵企業追求利潤；有限度增加工人工資、恢復獎金制度，增加後的平均工資約為人民幣五十至五十五元，獎金制仍在試辦，若干試辦單位所發獎金數額，約佔工資總額百分之八左右，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中共並已對某些偏高現象提出指責，要求迅加糾正，其嚴重者還要追究責任，依法處理。此外，為解決資金與技術兩大困難，中共決定襲用國際通行而又有利的方式，積極引進先進技術，盡量利用外國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除已向西方國家洽商大量貸款，並用共產國家很少採用的加工出口辦法，來吸收外資。

農業方面，也是採與工業改革類似的政策。(一)下放權力，將所有權、使用權、生產權及分配權，都統一於公社各級基本核算單位（主要是生產隊）。(二)在不准分田單幹、包產到戶前提下，允許按訂額計工，按時計工，包工到作業組。(三)恢復「大集體下的小自由」，但要限制其消極作用，不使誘發資本主義傾向。對自留地的限制以雲南為例：在地少人多地區不得超過耕地總面積百分之五，地多人少地區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即連在後一類貧瘠地區，每戶自留地總數也不得超過一畝。家庭副業只限於恢復「正當的」，並施以嚴格管理，使逐漸縮小。對集市市場也用控制及逐漸縮小方策，禁止非法活動，打擊投機倒把，「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四)提高糧食統購及其他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用工業品的售價，減輕農村不合理負擔。(五)嚴格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如設立超產獎、超額完成投工任務獎等，適當增加其口糧及現金分配。一九七八年分配情況，富庶地區如廣東東莞，每人每月口糧平均四十多斤，全年現金收入一四四元，貧窮地區如甘肅，規定全年口糧最低點為三百斤，不夠的設法補足，增產者適當提高。黑龍江已擬定七年計劃，預定到一九八五年，使農民每年平均現金收入，由現在一百元左右，增至一百五十元左右。

中共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政策，也為適應加速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重大改革。要者如改變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甄選成績優秀的

高中畢業生接受大學教育；提高教育質量，恢復傳統教育制度下的正規學校，試辦重點學校，恢復及增設二百多所大專院校，確立研究進修制度。一九七八年並派遣四百八十多名留學生，赴二十八個國家研究進修；增加知識課程，重視科學教育，使教學內容與教材符合現代科技發展的要求，並使教學手段逐步實現現代化。儘管如此，教育為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基本方針仍然沒有改變。高等學校招生仍重政治條件，要「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並「決心為革命學習」，才有資格報名應試。學校仍設有政治課和勞動課，知識青年下放政策基本未變，僅作較大的技術性修改。除此而外，中共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識份子變換階級屬性，將之歸屬於工人階級，作為「依靠力量」，但依然要接受同工農、幹部一樣的教育改造。

在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方面，對黨內，新路線的兩項重要決定，其一是結束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羣衆運動，但鄧小平派仍堅持，必須徹底打垮這兩個反對勢力，並藉整肅與平反，完成權力結構由「小雞帶老雞」到「老雞帶小雞」的轉變和改組之後，運動才可以結束；其二是確定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經由發揚民主、厲行紀律檢查，端正黨風，重建黨的領導權威。對黨外，除上述放寬經濟限制，改善工農生活，大幅度改變知識份子政策以外，新路線對政治限制也比較「十一大」路線放得寬些。鄧小平一伙認為，唯有加強民主，運用「革命統一戰線」的方式，建立與各階層人民廣泛的政治結合，才能達成安定團結，使中共政權的統治臻於隱固，為加速經濟發展開拓有利的政治環境。他們說：他們所提倡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這種建設的人，都屬於人民範圍，享有民主權利；而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是「人民的敵人」，不享有民主權利。又說：他們提倡的民主，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也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離開這些限制，就會產生無政府主義與極端民主化的偏差，這種偏差與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能相容。這與「十一大」路線基本上並無差異，不同的是：華國鋒一幫主張「放社會主義的香花，鋤反社會主義的毒草」；鄧小平一幫則主張對錯誤的意見，對越出規範的民主要求，也應該容忍，採說服教育方法予以糾正，使民主保持正確方向，但對「壞人乘機搗亂」，也主張使用專政方法，嚴厲處治。在實際行動方面，鄧派更為全部右派份子，以及已經改造好的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摘掉帽子，即解除其政治管制，用以安撫知識份子和農民。文革中被抄家並下放體力勞動的私營工商業者，也重新被列為統戰團結的對象，以發還被抄財產等懷柔措施加以籠絡，對具有技術專長及業務管理才能的私營工商業者，並調離勞動工作崗位，另作適當安排。但統戰運用依舊遵循「政協」新章程規定，以擁護共和社會主義制度，遵守並執行中共所定政綱政策，繼續從事自我改造為不容違犯的共同守則，其各種新措施也只在調動一切可用力量，支持現代化建設，而非意味其權力分配有何根本改變。

新路線的難題及其可變性

鄧小平一派中，有人把他們的新路線，同一九五六年「八大」路線連在一起，他們引用來支持新路線的毛澤東言論，也是在「八大」前後的舊作。但「八大」路線提出不到一年，尙未形成完整政策體系以前，就因為「鳴放」失敗，毛思想向極左轉向，而被束諸高閣。一九六〇年代前期的劉少奇路線，大致上符合「八大」路線，這兩個路線，文革期間都被打成「修正主義」。目前的鄧小平路線，很多地方是劉少奇路線的回潮，不過，兩者間還有很大差別。就放寬的程度觀察，鄧路線比劉路線在政治上放得大些，經濟上放得小些。劉路線只注意放寬，未注意防制其必然產生的不利影響，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激起爭自由的風潮；鄧路線則在放寬的同時，採取許多防範措施，希望能避免重蹈劉路線失敗的覆轍。那麼鄧路線算不算修正主義路線？修正主義一詞，久已為很多國家共產黨人在權力鬭爭中所濫用，只要政敵對黨的傳統理論和路線稍作修改，就拿修正主義作武器，把他們打成異端。依照這一標準，也可以說鄧路線是修正主義路線。然而，修正主義原有其特定含義，而以其特定含義衡度，鄧路線既未修正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未背離毛澤東路線的基本方向，稱之為修正主義路線實欠允當。

就常理推測，新路線對中共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當有裨益，但中共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各種改革受到社會主義這個框框的束縛，難以改得徹底，也就難以充分發揮功效，更難望產生北平所渴求的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成長速度；在資金嚴重短絀、技術與設備極端落後情況下，難望有助於它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何況中共也承認，它現在仍陷於「百廢待興，百亂待理」的困境，要醫治好文革造成的內傷和外傷，扭轉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混亂局面，還需要兩三年的「緊張作戰」。

新路線的出籠，是鄧派的一次重大勝利。但是，制定新路線的三中全會，卻沒有接受新路線的理論基礎，即鄧小平的唯實踐論，僅將之作爲尙待繼續討論的問題給以「高度評價」。劉少奇路線仍被中共確認為修正主義路線；而三中全會一面通過類似劉路線的新路線，一面肯定文革的「反修防修」的作用。全會雖提到文革的缺點錯誤，却又不作總結，顯然是要避開這個敏感問題。對毛澤東的評價，全會的處理，是用改造的方法，來保全毛的偶像地位，並使這尊偶像具有實用價值。這一處理原則，各派似乎都已同意，不過，如何評定毛澤東的功過，對晚年的毛思想和毛路線是全盤否定，還是局部否定，他們之間仍然有爭執；也有人主張維持毛澤東原來形像，反對改造。中共高階層對這幾個與路線抉擇有重大關連的問題，仍有分歧與爭鬭。此外，從北平到地方，新路線的很多重要政策，仍舊遭受強烈反對和抵制，顯示毛思想與毛路線還有很大影響力，與鄧派持不同意見的華國鋒、葉劍英等人也有不少支持者，理論及路線鬭爭並沒有完全塵埃落定。

路線鬭爭又與權力鬭爭有密切關連。三中全會雖然決定結束批鬭林彪、四人幫運動，但鬭爭實際還在持續進行，從中央到省市一級，也還有新的整肅行動。鄧派並提出警告，注意「震派人物與風作浪」。胡耀邦甚至說：要改革就不怕挨棍子，不怕擔風險，犧牲掉性命也在所不惜。這又證明，鬭爭不僅沒有停止，而且還十分激烈。一個已爲北平承認的影響是：反對新路線的人「不准實事求是」，有些幹部也就「不敢實事求是」，這就阻礙新路線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

北平又透露，使幹部不敢實事求是還有兩個原因：(一)從反右派運動到現在，二十多年所養成左比右好、左比右保險的觀念牢不可破；(二)中共政策的左右搖擺，反覆無常，已「失信於民」。除此而外，幹部素質低落，也是落實新路線的一大障礙。中共承認，要完成工作重點的轉變，連黨的中央與地方高級幹部，都要重新學習，才不致「掉隊」；企業與事業單位的幹部外行多於內行，中共的初步計劃，是使懂技術、會管理的幹部，在領導班子中達到百分之三十，然後再逐步達到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除了這些阻礙和困難，新路線還面臨來自另一方面的劇烈衝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由「中國新聞社」所發中共社會科學院法律研究所召開民法法制座談會的消息，提到「會議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所列十三個為發揚民主突破的「禁區」，有一個是人權問題。但四天以後，由「新華社」所作報導，却將這些全部刪去。而在這前後，一些由個人署名發表的言論，如社會科學的真理沒有階級性；「私」並不就是資本主義；民主與專政是等質關係，不能認為專政高於民主；審判要獨立，任何機關或個人不得參與及干涉，都已超越傳統的馬列主義。這些言論，並不代表也不足影響中共的政策，但其出現也顯示，知識界某些有力人士，正在利用中共有限度開放的機會，鼓吹民主自由，鼓吹在制度上作重大變革。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共廣播及北平等地外電報導所作不完全統計，從去年十一月中旬開始，北平、上海及其他七個省的若干城市與農村地區，都爆發反獨裁、爭自由的羣衆行動。參加者有城市和下放知識青年、工人、農民。他們以貼大字報、街頭集會、遊行示威、請願、絕食、怠工等方式，爭取民主自由及澈底改善生活。來自各地的農民聚集北平，連日示威請願，要求解散人民公社，讓人人有飯吃。上海下放知識青年更阻攔火車、損壞公路，衝擊機關；雲南也有五萬下放知識青年發生騷動。各地羣衆行動的具體要求雖然不盡相同，但總的目標都在爭取人權，實質上是一次具有相當規模的人權運動。

就路線問題分析，高級知識份子的鼓吹變革與人權運動的興起，暴露新路線的政策性退却，並未能換得知識份子與工農的由衷支持，他們覺得鄧小平退得太少，並乘機起來爭取更多更大的自由。北平出動警察逮捕示威羣衆後，又有大字報責罵鄧小平是偽善的騙子，同林彪、四人幫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這一變化又替中共的路線鬭爭火上加油，反對派發動攻擊，指責鄧小平退得太少，退出了亂子。二月上海事件後，即連鄧派也改換腔調，認可「現在是堅決肅清無政府主義的時候」。這並不意味新路線又將有大改變，但在開放未久的民主窗櫺上，掛上誅殺異己的寶劍，縱使只是應付緊急事件的臨時措施，也會使新路線的懷柔作用大打折扣。

面對來自黨內黨外，左面右面的阻礙和衝擊，再加上其他許多條件的限制，鄧小平一伙要在今後兩三年內化亂為治，完成工作重點的轉變，為高速發展經濟準備好條件，進而在不足二十年時間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實在非常艱難。由此不難看出，新路線的計劃目標與政策設計，缺乏周詳考慮，對客觀環境與主觀能力都估計過高。同毛澤東二十年前的大躍進計劃同樣急躁貪功，困難重重，中共的政策路線仍難望穩定。

鄧小平外交路線與戰爭危險

李 廉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年，在其政策路線或左或右的搖擺中，曾有兩次最顯著而重大的轉變，一次是六十年代極左的轉變，一次是七十年代極右的轉變。

六十年代的轉變以毛澤東爲中心，曾有長期醞釀過程。中共政權成立後，雖有韓戰，但三年經濟恢復期，緊接着提出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時的一般構想還是相當穩健的。中蘇兩共關係的惡化及鳴放運動所激起的反共風潮，是毛澤東朝向極左路線轉變的動因。一九五八年秋，他推行三面紅旗運動、挑起臺海戰爭，不久又與印度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此三者，是爲期逾二十年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真正的開始。其後經劉少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右傾，又導致文革奪權、紅衛兵造反、林彪事件、四人幫當權，乃至於由批林而批孔、到最後的批鄧反右，中共的極左路線，無論在對內或對外政策上，在文革時期均已發展到極致，而毛澤東的生命不久亦隨之而結束。

我們檢討中共此一時期的對外政策，一方面強調革命的馬列主義，謀奪蘇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一方面又強調非共世界的暴力革命。「九大」以後，確定「反美、反蘇、反各國反動派」的三反政策，幾使中共在國際間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但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發生，美國在越南的持續作戰又間接威脅到中國大陸西南的安全，使中共陷入兩面受敵的戰略困境，爲求生存，已是勢窮力蹙，非變不可了。

七十年代中共極右路線的轉變，明顯地以鄧小平總其大成。當然，這一轉變亦有其動因和醞釀的過程。六十年代極左路線所造成的損害和危機是其動因，由中間地帶而三個世界理論及四個現代化構想的提出是醞釀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中共曾經過內部劇烈的鬭爭，包括周恩來晚年和文革派的鬭爭、毛澤東死亡前後接班人的鬭爭、乃至於華國鋒政變後的揭批四人幫、鄧小平復出、中央及地方權力結構之一再改組，以及了無止境的翻案平反等等，此一由極左到極右路線轉變所引起的衝激迴盪至今猶在持續中。若純就對外關係而言，自一九七一年進入聯合國，一九七二年與尼克森發表上海公報，同年與日本建交，此數年中，中共一變其六十年代自我孤立的情勢，在外交上有快速的開展。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一切職務。自此以後，理

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以及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奉為處理一切事務的基本方針。在此方針下，中共無論對內對外政策，俱各顯有大膽的轉變，且已逐漸成爲定型。而變的目的，基本上在求緩和、減除日益嚴重的蘇俄威脅，盡可能爭取一段和平時間，藉以醫治毛澤東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創傷；內而安撫工農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嚴重不滿，企求安定團結，外而爭取必要的資金、設備、科技等一切可能的助力，以求完成在世界權力關係中由絕對劣勢到相對優勢的實力地位的轉化，而在本世紀末成爲所謂工農業、國防與科技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稱鄧小平爲中共七十年代極右路線的總其成者，乃對六十年代毛澤東極左路線的比較說法。若對鄧小平路線爲獨立的價值評斷，目前仍爲時過早。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鄧小平復出，在同一會議中，鄧某對於中共外交政策即已發爲大膽的論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特殊見解。他說：「對外關係要貫徹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方針。什麼要黑朋友、窮朋友、小朋友，而一律反對白朋友、富朋友、大朋友的外交路線，是完全抹煞國際階級鬥爭形左而實右的錯誤路線。」鄧的外交，顯然是將「白朋友」、「富朋友」、「大朋友」置於優先重要的地位。爲此，他已無意再依階級觀點爲敵友之區分。一九七八年十月，鄧某爲「和平友好條約」換文訪問東京，當記者詢以反霸權條款是否與日本夙所堅持的「全方位外交」相抵觸時，他答道：「依我個人理解，所謂全方位外交，就是同任何國家謀求友好。如果照這意義說，中國（共）的外交也是全方位外交，只是加了一條，就是反霸權。」以反霸權——實即反蘇爲外交政策的總綱，不排除與任何國家謀求友好，自更無國際階級鬥爭的立場可言。

以反霸——實即反蘇爲外交政策總綱，是鄧小平極右外交路線的特點。聯美制蘇雖然是珍寶島事件後中共外交的主要方向，但毛澤東、周恩來或華國鋒均不會排斥對蘇和解的可能，鄧小平則對此採取更爲決絕的態度。一九七七年七月他復出之初就說過下面的話：「與以蘇共爲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集團的根本分歧是絕對性的、永恆性的。不僅我們這一代，就是華國鋒同志、汪東興同志這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接班人，也很難有可能和蘇共再次接近、或恢復往日的團結與友誼。」^①

此顯示，鄧某所執行的外交路線，乃百分之百以反蘇爲基調。如果毛澤東曾有左的一邊倒，如今鄧小平就是右的一邊倒。然而，對於鄧的一邊倒，仍只能在策略範疇內評估其意義，而不能視之爲政策目標。首先，他聯美反蘇，並不放棄對美鬥爭。他曾譏笑「美帝」，謂美帝的科學技術可稱世界第一，但對共黨慣用的國際統籌策略却是一無所知。從而他強調「我們的作法是要從鬥爭中求團結、求聯合，聯合中絲毫不放棄鬥爭。」基本上，鄧某的一切策略運用，仍然是百分之百以自利（而非與任何國家的共同或平行利益）爲目標的。他自許爲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當前國際情勢，「不會變到敵我不分的地步」。他對與美國之間關係的估量是，「他們要利用中蘇兩黨的分裂，來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來牽制蘇聯對他們的威脅。」因此他問道：「我們爲什麼不可以

註① 凡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復出之初所爲之言論，均見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的講話。

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間隙，來採取對我們有利的政策呢？」^②

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與間隙以自利，依鄧所說，利在推遲戰爭，「使戰爭的時間延遲到本世紀之後」；其次是「把握機會，有條件地引進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主要是科技方面的技術和設備」；再其次就是「中（共）美關係正常化之後，有利於臺灣問題的解決」，而「國內的各種不利因素都會逐漸消失，西藏、新疆地區的一些混亂，亦可以迎刃而解。」

基於此等利益，鄧自一九七七年復職後，即將其對外關係的重點置於西歐、日本和北美，此與布里辛斯基的三邊主義形成巧妙的配合。一九七八年二月，分別與歐市簽訂為期五年的非優惠性貿易協定，與日本簽訂輸出入各一百億美元的八年貿易協定。同年八月，簽訂對日和平友好條約，十月，親往東京換文。十二月中旬，宣佈對美建交，同時接受訪美邀請。今年一月杪訪美，與卡特政府簽訂科技合作、文化交流與領事事務三項協定。返程再次訪日，與大平首相會談。無疑地，一九七八年乃鄧小平極右外交路線呈現為顛峯狀態的一年。

二

以反霸即反蘇為總綱的鄧小平外交路線，使整個世界的權力關係為之改變，特別是導致蘇俄最強烈的反制措施。

事實上，在世界權力重組、美蘇兩強關係未定的過程中，中共作為現實力量較弱而發展潛力特大的一環，其外交動向之對整個世界發出深遠的影響，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整個六十年代及其以前的一段時期，美蘇兩強對峙，雙方所從事的全球戰略設計與部署，注意的焦點主要是歐洲。七十年代開始以後，隨中共外交政策路線的轉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其對蘇政策呈現為矛盾的兩面，一方面希望在限武、裁軍等問題上達成協議，實現對蘇和解；一方面又基於多元化均勢制衡的理論而拉攏中共，不斷刺激蘇俄，使其愈益加緊擴軍備戰，不斷向外擴張。

嚴格地說，若以對蘇和解為目標，西方拉攏中共的作法初未獲得任何效果，而蘇俄的擴張則已見於具體的行動。一九七一年七月，美總統尼克森宣佈將於翌年春訪問中共，蘇俄旋即改變其戰略部署，在歐洲方面採取守勢，而循由北向南及由西向東兩條弧線向亞洲及西太平洋全面推進，前者自海參崴南下，經韓國、日本、臺灣、菲律賓沿海到中南半島；後者由地中海而印度洋、西亞、南亞、出麻六甲海峽到中南半島。此兩條弧線戰略部署既對中共完成外線三面的包圍，又同時以日本本土及美太平洋的海空基地為目標。循此兩條弧線，蘇俄以締結具有程度不同軍事同盟條款的友好合作條約為結合友國的方式，自一九七一年以來所締結者有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蘇伊（拉克）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蘇土（耳其）

註② 同註①。

友好聲明（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七日）、蘇索（馬利亞）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簽訂、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由索國宣布廢止）、蘇安（哥拉）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蘇莫（三鼻給）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蘇越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衣（索比亞）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蘇阿（富汗）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蘇俄與越南、衣索比亞、阿富汗所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均在日本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之後。蘇俄與越南結盟將使金蘭灣成爲蘇俄海空基地，又在非洲之角，蘇俄失去索馬利亞的柏拉港，却自衣索比亞取得馬薩華港作爲補償，又南葉門傾向於蘇俄後，亞丁港亦可供其使用。此爲蘇俄積極從事全球戰畧部署的鐵證。在擴軍備戰方面，去年十一月，小型中、日「中國大陸問題」座談會舉行於臺北。據出席會議的日方三好教授透露：經多位專家以計量經濟學程式研究一九七八年蘇俄經濟狀況，發現其一般投資下降爲零，而國防軍事投資已增加至極限。此種情勢曾見於珍珠港事件前夕之日本，因而估計蘇俄正全力擴軍備戰，並預期其國防軍事力量將於八十年代中期升至巔峯，屆時非求戰不可。

蘇俄擴軍備戰及加緊從事全球戰畧部署的行動，既可視爲中共國際反霸統戰外交的反應，亦可視爲中共繼續此一外交路線，積極爭取與西方聯合的動因。於此，人們不妨檢視一九七八年世局的全貌。美蘇限武談判進行六年，幾經波折，雙方新武器技術的發展，業已超越第二階段限武新約實質問題的範圍。新約談判雖有進展，但却未能達成協議。此其一。中東和平，雖經大衛營（一九七八年九月）會談達成三個月內簽訂和平條約的協議，但由於阿拉伯世界的沉重壓力，埃及提出有關約旦河西岸的連鎖建議，爲以色列所拒絕，雖經范錫年抄穿梭奔走，結果仍無功而退。此其二。伊朗變亂日益升高，卡特政府肆應困難，先則支持巴勒維，繼而又促使巴勒維出走，白泰爾的文人政府亦未能恢復秩序，使石油的生產與供應大幅減少。此其三。非洲之角，年初有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的邊境戰爭，衣國得蘇俄及古巴之助獲勝，十一月，蘇俄與衣索比亞簽約，鞏固了在此一戰畧性地帶影響力的地位，此其四。位於中亞戰畧要衝與中共、巴基斯坦、蘇俄、伊朗交界的阿富汗，在一次流血政變後選擇了馬克斯主義，年杪與蘇俄締盟，此其五。應該說，在一九七八年一年中，中共曾全面展開其對外統戰外交攻勢，如華國鋒之訪問北韓、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伊朗，鄧小平之訪問北韓、日本、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李先念之訪問菲律賓、汪東興之訪問高棉、以及其他各種代表團外出訪問之絡繹於途，未始非在此等背景下，針對整個世局所採取的因應措施。然而一九七八年所有一切國際關係的變化，其重要性均遠遜於日本與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之簽訂，及年杪美國與中共之宣佈建交。此二者，應視爲鄧小平極右外交路線的重大收穫，影響所及，無疑地，已造成以美蘇爲首世界兩大權力愈益尖銳的對立，而亞洲及西太平洋的情勢更告緊張。

西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美國防部長勃朗出席美參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就卡特政府與中共新關係的建立作證。當其論及「正常化」對美國安全利益之含義時，首先強調其與中共建交的戰略基礎：（一）中共對世界事務有其日增的影響力。（二）由於蘇俄與中共之分裂，美國在亞洲方面所承受的威脅，已較五十年代大為減少。關於後者，他認為，由於中共和蘇俄敵對日益加深的結果，蘇俄必須對付來自中共的有關其自身安全的挑戰。目前沿中國大陸邊界，蘇俄已部署總兵力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地面部隊及戰術空軍。而美國無須像前此那樣，在不同的前線，同時面對兩個主要的敵人，因而改善了安全的情況。美國的軍事資源可被轉移於其他目標，基於一般目的所設置的武裝力量，也因而獲得了更大的全球性的彈性。而蘇俄却必須為他們的所謂兩線安全問題煞費周章。

依勃朗此說，美國其所以尋求與中共建交，主要目的即在於消極方面扭轉「在不同前線、同時面對兩個主要敵人」的不利形勢，而積極方面轉而使蘇俄在歐亞兩洲同時受敵。換言之，在全球戰略觀點上，作為美國國防負責人，勃朗已公開承認其所以聯合中共，即爲了要對付蘇俄。勃朗在同一證辭中，列舉中共因在外交上採取「溫和政策」所形成的與美國的平行利益，包括支持一個强有力的北約組織、同意美日安保條約關係的存續、贊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繼續停留」、積極鼓勵東南亞國協的團結和諧，以及共同致力於避免在朝鮮半島爆發新的戰爭^⑧。勃朗認定，中共與蘇俄關係的分裂將會繼續，而中共領袖們尋求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利益，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改變，因而美國極少有與中共恢復對抗的危險。勃朗所透露的戰略構想與布里辛斯基的三邊（北美、西歐、日本）主義亦完全吻合，就因爲此一戰略構想，美政府力促日本與中共簽約，隨即完成其與中共關係之所謂「正常化」，從客觀上肯定了美、日、中共關係爲三角同盟。

人們不難從日本、中共和約交涉及美國中共建交談判中發現鄧小平外交策略的運用。

以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爲總綱，乃鄧小平外交策略不變的原則。作爲日本、中共關係基礎的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與周恩來所簽署的建交聯合聲明，及作爲美國、中共關係基礎的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簽署的上海公報，均同樣列有反霸權條款，換言之，即中共堅持，經美日兩國同意以「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及世界任何地區尋求霸權」爲彼此關係建立的基礎。此後，日本福田內閣於一九七八年八月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美卡特政府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與中共發表建交聯合公報，其中亦均列有反霸條款。同年十月鄧小平爲和約換文訪日，十月二十五日在記者會中強調「反對霸權主義是中（共）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核心」。今年一月杪鄧小平訪美，二月二日離華府前與美政府發表聯合聲明，亦列有「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謀求霸權」字樣；又一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華府記者會中更公然叫囂：「美國、中國（共）、日本、西歐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霸權主義。」

註⑧ 見勃朗在美參院外交委員會證辭。

爲確立此形式上的反霸同盟，鄧小平曾不惜在某些實質問題上作出讓步。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共與日本在和平友好條約的最後談判期間，關於釣魚台問題，鄧小平向日外相園田直表示：他保證今後不會再有類似同年四月間的事件發生。此語，實有悖中共一向主張對釣魚台擁有主權的立場。又日方所提中共與蘇俄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問題，鄧小平亦表示將於今年四月（期滿前一年）通知蘇俄廢約。

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起，美國與中共關係之所謂正常化，先後經六年又十個月時間始告完成，其中雙方所共同承認的最大障礙即爲所謂臺灣問題。依美方宣布，在最後談判期間，鄧小平曾作三項讓步：（一）美國表示期待由直接有關雙方（中華民國和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並繼續關切臺灣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中共對此不加反對。（二）美國拒絕仿照日本方式於斷交時同時廢約，堅持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關於止約條款之規定，在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繼續維持協防一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鄧小平對此加以接受。（三）美國堅持在一九八〇年以後繼續有節制的供應中華民國防衛性的武器，鄧小平雖表示反對，但並不影響雙方達成建交協議。事實上，在中共與美國宣布建交前後，鄧小平均曾在臺灣問題上採取逢迎美國意願的立場，例如鄧小平十月在東京，承認中華民國與中共——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對立，亦爲今世被分裂國家問題之一，而此等被分裂國家問題之解決，往往需要一百年甚而一千年。今年一月，鄧小平接見美參議員葛倫時亦表示：「保證可以說臺灣的社會制度將由在臺灣的人民來決定，改變可能要用一百年或一千年。我的意思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將不會使用武力來改變那個社會。」

鄧小平寧在中共一向視爲與主權有關的問題上讓步，爭取與日本和美國建立反霸同盟，除了用以緩和來自蘇俄的威脅，進而與美國及其盟邦合作對蘇俄部署歐亞兩洲的鉗形戰略包圍外，當然也爲了要引進美、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設備和科技，進行其所謂四個現代化，希求從基本上改變其在世界權力關係中的劣勢地位，同時也企圖從國際社會徹底孤立中華民國，爲施展其滲透顛覆的毒計製造條件，以求最後將堡壘從內部攻破。

此外，筆者認爲尚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其一是，中共爲它的利益設想，意圖使美國及日本在亞太地區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美國與中共尋求所謂關係正常化和美國從越戰退出，幾乎是同時發生且相互關聯的兩件事。不久以後，卡特政府又宣佈從韓國撤軍的計劃。這使中共意識到，美國有逐漸從亞洲撤退的可能。在中共實力未能强大到足以與蘇俄抗衡以前，中共絕不願美國從亞洲撤走，這種唯恐美國撤走的恐懼——特別是在蘇俄勢力伸入中南半島以後，使鄧小平亟於完成與美國關係之所謂正常化；由於日本被稱爲美國在亞洲及太平洋的戰略支柱，所以拉緊美國，又必須與日本結盟。

以日美安保關係爲基礎，日本長時期對中蘇兩共採取等距外交。在中共看來，此所謂等距關係是無法長此保持的。事實上，日蘇兩國對於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的計劃，迄仍未曾放棄，近年來雖北方四島的交涉缺少進展，但兩國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例如

漁業的合作，亦頗有成議。中共認為，赫爾辛基歐洲安全會議之後，日蘇關係的演變對美蘇關係具有重大影響，倘日蘇合作而美蘇和解，其自身就絕無生存發展的餘地。又近年來日本在經濟方面與美國磨擦日甚，倘對蘇關係獲得改善，亦未始全無步向中間路線的可能。凡此，均非中共所願見。中共必欲將日本拖離其等距外交的軌道，在經濟上藉對日本財界的誘惑，政治上藉助於美國仍未喪失的影響力，迅與日本美國成立三角反蘇同盟。

筆者所擬討論的次一問題，是以鄧小平為靈魂人物的中共統治集團對戰爭的態度問題。

中共對戰爭的態度有其明與暗的兩面。在明的一面，中共強調美蘇基於戰略利益在全世界所從事的爭奪，使世界第三次大戰不可避免，特別是蘇俄所從事的無止境擴張，更是戰爭必然發生的根源。又強調美蘇爭奪的焦點及蘇俄擴張的箭頭均主要指向歐洲，因此戰爭亦將在歐洲發生。至於中共，則將儘可能推遲戰爭發生的時間，最好能推遲到本世紀以後，屆時中共已完成其在世界權力結構中由絕對劣勢到相對優勢的實力地位的轉化，即可佔着主動有利的形勢。迄今為止，中共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其所公開表示的對於戰爭的態度大率類此。

然而中共對於戰爭的態度確也有其暗的一面，此於喬冠華、耿飈、黃華、鄧小平歷次有關對日講話可以見之。所有中共領導人，在論述其聯美制蘇的統戰策略時，都特別強調其階段性，及在聯合中不排斥鬪爭。筆者深以為純自謀略觀點看鄧小平外交路線，實較前此既反美又反蘇的極左三反路線更為陰毒兇狠。過去中共同以美蘇為敵，美國與蘇俄對中共的共同戰略利益一致，只要美蘇避戰，為中共所企盼的所謂天下大亂的情勢就不會發生。如今天下三分，美蘇對第二、三世界形成爭奪，各種利害關係錯綜複雜，而鄧小平經由極右的外交路線與美國、日本建立同盟，因而得能插手於世界事務，媒孽播弄於其間，就易於掌握形勢，選擇適當的時機，效當年「曹仁力戰東吳、孔明巧取荊襄」故事^④，使對其不利的戰爭變為對其有利的戰爭。基於這一觀點，筆者敢於判斷，鄧小平對於蘇俄可能採取的反制行動——甚而率先對中國大陸用兵，未始全無警覺，但他的基本打算是，絕不孤立地單獨對蘇俄作戰。一旦戰爭發生，他必將盡全力拖美國和日本下水。等到戰爭擴大為全面大戰，他可能師當年列寧故智，轉而在有利條件下與蘇俄謀和，坐山觀虎鬪，攫取戰爭的最大利益。

四

從任何一角度看，以反霸為標誌的中共與日本、美國新關係的建立，均不會有助於世界的和平，而是使戰爭的危險更為迫近。

註④ 見喬冠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日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

確定的事實顯示，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完成和平友好條約的換文，十一月三日，蘇俄與河內完成結盟，一個月後，由河內支持的「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戰線」宣告成立。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宣佈與美國建交，同月二十五日，越南和「團結戰線」的武裝部隊聯合發起全面進攻，而兩週後（今年元月七日）金邊陷落。

對於蘇俄與河內結盟以及越南入侵高棉的經過，中共有這描述：一九七八年，越南對柬埔寨的旱季攻勢之後，六月二十九日，蘇俄將越南拉進「經互會」。八月，將大量包括藥彈在內的各種武器，空運到越南。又源源不斷派遣軍事顧問人員進入越南，短短幾個月，蘇俄軍事顧問增加到四千多人。與此同時，蘇俄開始使用金蘭灣基地。十一月初，黎笋、范文同等越南領袖訪莫斯科，簽訂了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公然宣告兩國進行軍事合作。蘇俄向越南提供了新式米格——廿三飛機和兩艘兩千噸級護衛艦。十一月下旬，華沙條約成員國在莫斯科舉行首腦會議，蘇俄在會上呼籲華約國家增加軍費，共同支援越南。十二月三日，越南當局炮製了一個傀儡組織「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戰線」，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侵略軍分兵幾路向柬埔寨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

依中共觀點，高棉之戰，「出兵打仗的是越南、擂鼓壓陣的是莫斯科」；「它是大小霸權主義者共同勾結而發動的一場戰爭。越南地區的霸權主義是這場戰爭的直接罪魁，蘇俄社會帝國主義是侵柬戰爭的幕後操縱者和指使者」。蘇俄所以慫恿越南進攻高棉，「是莫斯科推行它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份」。因為，「印度支那是聯結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一個中繼站。蘇俄在印度支那取得立足點，西可以進出麻六甲海峽、經印度洋直達紅海、非洲之角；東可以馳騁太平洋，南下大洋洲。這樣，不僅控制了西歐、美國、日本的重要石油航道，而且形成了一個弧形戰略包圍圈」^⑥，中共的這些看法和說法並無錯誤，可是它故意忽略了一點：蘇俄與河內結盟乃至於支持越南打高棉之戰，也正在中共和日本、美國發展以反霸為標誌的新關係的同一時期。

事實上，蘇俄擔心美、日、中共三角關係可能在東亞形成類似北大西洋組織的軍事同盟，它所採取的反制措施尚不止此。首先，在蘇俄對美關係上，莫斯科顯已將和解暫行擱置，（第二階段限武談判暫告停頓，布里茲涅夫訪美計劃亦予延期）而日本與蘇俄的一般關係也較前大見緊張。其次，在軍事方面，蘇俄正在北海道以北的兩個佔領島嶼——國後和擇捉島建立強大空軍基地，進駐擁有坦克和大砲的武裝部隊，此舉，增強了對美核戰的優勢，同時對日本形成經常而直接的軍事威脅。蘇俄也加緊興建全長三、一五〇公里的貝加爾——阿穆爾即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在堪察加半島南端的彼得洛巴夫羅夫斯克港，建造新的海軍基地，另又擴建庫頁島南端的科沙克夫基地，同時不斷將西太平洋海空軍戰力加強，凡此均顯示，蘇俄有在其自認為適當時機一戰的決心。

以美、日、中共新關係及蘇俄反制行動為背景的中南半島的變局，打破了亞洲權力平衡，加深了戰爭的危險：就一九七九年

註⑥ 見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人民日報載「越南侵柬是蘇聯全球戰略的一部份」一文。

初的一般情勢而論，美國及其西方盟邦，顯然未能因聯合中共而獲致制壓蘇俄的效果，反而讓蘇俄取得了亞洲有利的戰略地位。這影響是十分深遠而巨大的。東南亞其他各國將難免陷入此所謂霸權與反霸權的爭奪之中，而東北亞的韓國鑒於美國之不可信賴，也正基於彈性外交的觀點，企圖別尋出路。最先從這一變局中冷靜下來的是日本。鄧小平二月初再度訪日，大平內閣已明白表示無意跟從中共的反霸路線，並勸告鄧某勿對由蘇俄支持的越南輕言報復。日外相園田一改其與中共宣布對美建交當時的態度，重又強調臺灣在東北亞安全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益以中日兩國政治人物頻繁的接觸，今後可望基於共同利益而強化彼此的合作。筆者深以為，以中美實質關係及中、日、韓三國的推誠合作為中心，進而穩定東南亞局勢，可能緩和當前的戰爭危機。但如蘇俄率先求戰，或中共藉助於美國聲勢而有過度的冒險，或因美國、日本、西歐對中共的支援而使其實力有過速的膨脹，則皆非可以逆料。蘇俄曾謂中共增兵越南邊境，無異於玩火，觀夫鄧小平近期言論，則無時無刻不旨在造成美、日、中共已建立三角同盟之印象。似此，純就客觀的觀點而言，玩火者又豈止於中共而已哉！

戰爭乎？和平乎？

——展望八十年代的亞洲情勢

三好 修

一 戰後國際秩序的崩潰

八十年代的亞太地區情勢，將面臨激盪的局面。一九七八年的日中（共）和平條約簽訂（八月）和美中（共）建交的決定（十二月），導致了這地區戰後均勢結構的決定性崩潰。經過這兩項外交大事後，中共政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已經成為積極的主要角色之一。美中（共）關係正常化，促使七十年代初期以來進行之中美蘇兩超級大國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SALT），並以此為基礎的東西方和解的展望，更趨複雜。

日中（共）和約的簽訂和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等於在事實上形成了以日美安全條約為媒介的美、日、中（共）反蘇協商關係。從而刺激了原來就有在歐洲和遠東「兩面受敵」的恐怖意識的蘇聯，並引起其軍事及政治上的激烈反應。日中（共）和約簽訂後，蘇聯即於同年十一月初與越南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事實上的軍事同盟，繼之則認可越南對柬埔寨的軍事侵略計劃。結果，反而使中共面臨北（中蘇邊界）南（中越邊界）「兩面受敵」的苦境。另一方面，蘇聯在日本正要求歸還的北方領土之中的

國後、擇捉兩島，建設陸海空三軍的半永久性軍事基地，加強了對日本的軍事壓迫^⑥。這些都是蘇聯對於不顧其警告而簽訂條約的中和日本所作的露骨的報復措施。

八十年代前夕的現在，在國際間最爲關心的是已經膨脹化、而且仍在繼續膨脹中的蘇聯軍力，以及以此爲背景的蘇聯擴張主義政策的動向。蘇聯軍事力量的陰影，正蓋住了整個西歐、中東以至非洲大陸。在遠東地區，隨着越南壓制柬埔寨後，蘇俄亦成功地把整個中南半島納入其勢力範圍內。俄羅斯的勢力伸及東南亞這個廣大地區，是在亞洲歷史上的第一遭。

這不但是對中國大陸，並且對東南亞國協各國——至少是對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各國——也增加了對安全的威脅。蘇越條約有無附帶秘密協定，使蘇聯獲得金蘭灣及峴港海空軍基地的使用權，目前尚無確切消息。如果能肯定地證實這一點，那麼它不但是東南亞各國切身的問題，而且對東北亞的日本、韓國及中華民國的前途，也將有直接的影響。

蘇聯的全部軍力，將在八十年代達到最高峯，而在一九八五年前後，有可能在戰略武器對比上，對美國佔壓倒性優勢。退一步說，假如國際間對戰略武器方面，公認了蘇聯對美國佔有相對的優勢，蘇聯使用普通武器（包括戰術性核子武器）的自由就必將顯著擴大（目前已經有其徵兆），勢必使整個國際局勢更加不穩。

蘇聯拼命地增強沿海邊區及堪察加半島的軍事基地網的戰略價值之詳情，將在後面加以說明。如果把它同蘇聯在中南半島尋求基地的動向結合起來看，那麼八十年代的東亞方面的戰略關係就可能發生重大的變化。日本列島將直接受蘇聯核彈攻擊之威脅，又因蘇聯太平洋艦隊的現代化和增強，必將對依靠中東石油爲命根的東北亞的日本、韓國和中華民國，構成更大的威脅。

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共的勾搭，已經打開了北韓和南韓重新談判之門，並促使北平對臺灣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如此，南北韓雙方對重新談判統一問題，目前仍停留在宣傳和戰術運用的階段，而其今後情勢的發展是很難預測的。至於臺灣的將來如何，一切就要看中華民國政府對北平的新提議有何反應了。不過無論如何，原來構成東北亞情勢不穩的這兩個分裂國家，已經有發生變化的徵兆，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朝鮮半島和臺灣的前途，將來有何發展？這也是八十年代東北亞政治大戲的一個重要戲目。

至於在軍事政治部門以外的經濟政治方面，八十年代的亞太地區——假如能够維持軍事上的安定——就將迎接所謂「汎太平

註① 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本防衛廳發表：「蘇聯軍隊自一九七八年著手國後、擇捉兩島的基地化，而到同年底爲止：(1)在兩島島上各設置了新的通信指

揮所，並在擇捉島上設置了航空管制設施，(2)在兩島島上新建了兵舍、彈藥庫、隱蔽壕等半永久性設施，(3)正在繼續擴大兩島的機場的跑道，並大規模地修建港灣工程，(4)駐留在兩島的陸上兵力爲四千乃至五千人。」蘇聯建設該兩島基地的目的可能是：(1)爲了對抗日、美、中共的反蘇協商所採取的軍事措施的一環

(2)無意歸還北方領土的無言的表示，(3)在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半島設立對美戰略飛彈基地的一環等等，有多種的推測。實際上可能有包括這些全部因素的綜合性動機。

洋經濟」的有生氣的局面。而且，在此十年之間，這地區採用自由經濟體制的各國（至少包括其中的大部分國家），將會有驚人的經濟發展。相反的，社會主義國家方面如果不肯修正其政策，將仍難脫離經濟停滯的苦境。同時，僅限於這一地區內來說，十年的時間足可確定非共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在和平的經濟開發競爭中誰勝誰敗。

不過，對於情勢發展的這樣相當樂觀的估計，是以該地區的軍事平衡和安定能繼續維持十年為前提的。但是，在今後並不能完全排除中（共）越戰爭、中（共）蘇戰爭或蘇越聯合侵略泰國等危險因素。尤其是，一旦發生中（共）蘇戰爭，可能把日韓兩國乃至中華民國和東南亞各國都捲入進去，而發展為遠東大戰。因此，八十年代的東亞非共國家——乃至共產中國——的最大戰略課題，應為如何避免地區戰爭。

在下面，對八十年代的亞太地區的情勢，擬從經濟政治學的層次和軍事政治的層次，逐項加以展望。

二 汎太平洋經濟的展望

八十年代的世界經濟重點，可能將由大西洋地區轉移到太平洋地區這一問題，西方經濟學家的意見，大致上是一致的。與西歐的經濟發展經過了成熟期而正在緩慢地進入衰退期的現象相對比，汎太平洋地區的各國，現在多已進入了起飛時期。其中像韓國、中華民國、新加坡等一些國家，已經學會運用現代工業技術和經濟經營技術，而正進入了躍進時期。在太平洋對岸的拉丁美洲，則有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阿根廷、智利等國家，也同樣地正在進入旺盛的經濟發展的階段。

尤其是韓國和中華民國，為第三世界提供了最光輝的經濟開發的模式。韓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NP），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間增加二百四十九%，其每年平均成長率達到七·四%。其GNP的實際數值，從一九六二年的二十三億美元成長到一九七八年的四百億美元，而獲得驚人的躍進。據預料：該國在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可維持每年平均十%的成長率，至一九九一年，其GNP可能達到一千七百億美元左右，而國民每年平均生產毛額可能達到八千乃至一萬美元的水準。韓國與經濟停滯的北韓之GNP的比例，目前是四比一，據預料一九八一年將成為七比一，一九八六年為十一比一，一九九一年為十五比一，而將很明顯地愈來愈拉大其差距^②。

在中華民國方面，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七年的GNP成長率是五十五·六%（每年平均成長率為七·八%），而一九七八年的成長率達到了十二%。該國八十年代的每年成長率，預料將亦有八乃至十%。一九七八年的國民每人平均生產毛額約為一千三百美元，而與中國大陸的二百美元（據中華民國方面估計）乃至三百四十三美元（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比較，亦有四乃至六

註② 參照大韓民主共和黨政策委員會編一九八六年——在躍進的韓國的將來（據日本世界日報社一九七八年翻譯本）。

·五比一的很大差距^③。依照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該項報告，估計本世紀末的中國大陸人口為十五億人，而其平均生產毛額為一千美元^④。如果這項估計可靠，那麼二十年後的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還不能達到目前在臺灣的一般人民生活的水準。（不過，依照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日本「經濟新聞」所載的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報告，對中國大陸的將來經濟發展作較活潑的估計，似亦應予注意。）

中共所推行的「四個現代化」政策，是在毛澤東死後，因為中共頭目們認識了以馬列主義的經濟開發模式究難擺脫其經濟的落後性，並承認它缺乏效率的結果。此外，印度、孟加拉、印尼、新加坡等國家，亦自六十年代下半年期以至七十年代之間，先後棄了教條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經營，而改變為更實際的混合式經濟形態。參加東南亞國協的五個國家，現均已達到經濟起飛階段，今後各國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預料可保持七%左右。「遠東經濟評論」雜誌注意到這一潮流後評論稱：「亞洲各國親眼看到了，本來是爲了避免類似歐美所經歷的人民悲慘處境而採取的走捷徑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相繼失敗之事實。這一地區，從中共的自認落後，蘇卡諾時代的印尼的經濟破產，尼溫緬甸及金日成北韓的窘境中吸取了教訓。於是，社會主義的教條已經讓位於更實際的進步的途徑。」^⑤

如此看來，在八十年代的亞洲，自由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和平的經濟競爭的結果，前者必將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而使後者澈底敗北。尤其在朝鮮半島的南北韓及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其勝負將更爲明顯。可以想像，這對韓國和中華民國的前途——甚至整個東北亞的情勢，將有深刻的影響。現已被納入以蘇聯爲主的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圈內，而堅持走蘇聯路線的越南，今後必將在亞洲非共國家活潑的經濟發展中落伍下來而變成孤立，乃是顯而易見的。越南進攻柬埔寨雖獲初步成功，但是柬埔寨人民仍採用游擊戰方式繼續反抗，從而使本來就疲憊不堪的越南經濟更趨惡化。

八十年代應有的「汎太平洋經濟」發展的牽引車，是日本和美國——尤其是日本。日本的GNP，在今後十年間將由現在的一兆美元增加到二兆美元，美國即可由現在的二兆美元提高到三兆美元。日本的GNP在一九七八年，已與蘇聯並肩，而到一九九〇年時可能高於蘇聯一·五乃至兩倍（請參照附表）。

註③ 世界銀行估計共黨中國一九七五年的GNP爲三百八十億美元。

註④ 參照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國際先鋒論壇報（I.H.T.）“Economic Realities Seen Blocking a Modern China,” NYT Story 1文。

註⑤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79 Year Book,” Hong Kong, 1979, p. 14.

(附表一) 日美GNP比較表(預測)

美 國	日 本		美 國
	(1)	(2)	
一九七八年	四八	五七	四八
一九八〇年	一〇〇	六〇	五三
一九八五年	一〇〇	六六	六八
一九九〇年	一〇〇	六〇	八六

(附表二) 日蘇GNP比較表(預測)

蘇 聯	日 本		蘇 聯
	(1)	(2)	
一九七八年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九八〇年	一〇〇	一〇七	一一四
一九八五年	一〇〇	一二七	一五七
一九九〇年	一〇〇	一五〇	二一六

(註) 估計每年平均成長率：美國四%，日本六%，蘇聯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年為三%，一九八一—一九九〇年為二·五%。

(1)以美金一元=二〇〇日圓，(2)以一美元=一八〇日圓，(3)是一美元=二〇〇日圓(一九七八年)，一美元=一六一日圓(一九八五年)，一美元=一三八日圓(一九九〇年)計算。參照日本國民經濟研究協會於一九七八年九月發表的「一九九〇年的產業構造」報告。該報告推測，在八〇年代的日圓對美金每年平均升值率為三%。

戰爭乎？和平乎？——展望八十年代的亞洲情勢

蘇聯的GNP用美金折算。美國總統的一九七八會計年度國際經濟報告中，估計蘇聯一九七六年的GNP為九、三七〇億美元。附表是以此為基礎而推算。

(附表三) 日本的國防預算推算表

	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五年	一九九〇年
對GNP的百分比	〇・九%	五%	五%
(1)	一〇・五	七五	一〇〇
(2)	一一・六	九〇	一二〇
(3)	一〇・五	九三	一四五

單位：十億美元（以一九七八年的美元值計算）

至少在經濟部門來說，日本差不多已經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超級大國，是沒有疑問的。既然如此，日本的政策對所有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自然會有重大影響。

到八十年代中期，韓國和中華民國亦將從目前的開發中國家進入已開發國家。韓、華一旦成爲「先進國俱樂部」(OECD)的會員以後，日、韓、華可能需要有某種經濟合作的組織。其組織形態，在基本上可能類同歐洲共同體(EEC)以便維持平行的分工合作體制。日、韓、華的人口合計有一億七千萬人。美國的一部分經濟學家，從經濟活力上觀察，預料將來由日、韓、華結成的「東北亞EC」可能成爲八十年代世界貿易的一大中心。然後，這三個東北亞「國家」將如何與東南亞國家之間作進一步的合作，可能成爲迫切問題。

美國對東亞各國的貿易總額已經超過對歐洲共同體的總額。一直到整個八十年代，美國與亞洲的經濟關係可能更爲加深。美國與中共建交，是加快這一趨勢的新因素。東北亞與拉丁美洲的經濟交流亦將會加快其速度。過去，爲促進太平洋各國經濟聯繫的最大障礙是太平洋兩岸遙遠的距離，但是已因運輸、通信(通信衛星)和電腦技術的發達，事實上可予克服了。

對如此活潑的「汎太平洋經濟」發展的可能性，亞洲的共產政權國家將如何適應呢？正在走現代化路線的中共政權，已經開始向本地區的非共國家打開其門戶。北韓如果跟着中共這樣做，那麼南北韓談判就有可能進入新的局面。越南在較晚時期，說不

定也會考慮國內經濟發展的效率問題，而開始擺脫其僵硬的馬克斯主義經濟路線。在時間上來說，那是越南切斷對蘇聯的從屬關係，而蘇聯勢力不得不從中南半島撤退的時候。日本和美國到那時候對越南給予經濟援助就能發生政治效果。錯誤的過早的援助，反而會鼓勵侵略者而徒增東協各國的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主張它是一個亞洲國家的意圖所在。西伯利亞的地下確實埋藏有豐富的礦物資源。不過哈曼·甘博士認為，因為開發冰凍地帶的地下資源需要格外高昂的成本，加上沒有效率的蘇維埃官僚主義作祟，如果對開發西伯利亞有何期待，將會落空。何況，現在的蘇聯，並不優先考慮經濟開發，而把國家的精力多集中在以武力為背景的擴張主義上面。蘇聯頭目們，是想把本國的經濟政策不能解決的事情，用武力來解決的。如果蘇聯有何動靜，在本節所預料的有關「汎太平洋經濟」發展的展望，也有可能導致全面性的走樣。

三 正在加強的蘇聯遠東軍事基地網

在八十年代，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之源泉，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增強及其擴張主義。蘇聯的世界戰略，是企求在戰略核子武力超過美國，並在歐亞大陸和非洲獲得使用傳統戰力的最大的行動自由為目標的。蘇聯在最近數年來，已經開始增強在遠東的陸海空軍兵力並促進其現代化。至日中（共）條約簽訂和美中（共）建交後更加緊了其步伐。一九七七年九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日蘇專家會議^⑥（筆者亦參加）席上，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長葛爾奇·阿爾拔托夫博士指出：「包含有反霸條款的日中（共）條約將會破壞中（共）蘇目前的平衡關係」，一方面表明了蘇聯反對該項條約的立場，另一方面警告日本「為何不惜付出那麼大的犧牲而一定要簽訂日中（共）條約呢？」蘇聯疑懼的是，日中（共）條約成立後，事實上形成了美、日、中共的反蘇協商關係，即等於在西歐和遠東出現了「兩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紅星報」評語），使蘇聯「兩面受敵」。阿爾拔托夫的對日警告並非空言恫嚇，能從日中（共）條約簽訂前後以來，蘇聯在遠東正面顯著加強並擴大其軍事部署的動向，予以證實。他所說的是實話。

這篇短論是沒有詳述蘇聯在這一地區加強軍備情形的餘地的。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已經開始致力於遠東軍事基地網的加強。蘇聯的主要軍事基地網是由西邊的科拉半島（以科拉灣、莫曼斯克港及貝洛莫爾斯克的海軍基地和造船廠為中心）和遠東的海參崴、蘇維埃港及彼得洛巴甫洛夫斯克三個主要基地所構成的。

中共對西方國家的接近和「四個現代化」政策（蘇聯最關心其中的國防現代化），又刺激了蘇聯宿命性的「來自中國的威脅

註⑥ 指一九七七年莫斯科舉行的「第四屆『亞洲和平』日蘇專家會議」。

一的惡夢。蘇聯乃以此為轉機，開始加強原來視為次要的遠東正面的軍事基地網。除了在海參崴和堪察加半島的彼得洛巴甫洛夫斯克附近正在建設新海軍基地外，在庫頁島南端的科爾薩科夫基地、沿海邊區的蘇維埃港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現有軍事設施以及黑龍江沿岸的科墨索莫爾斯克的造船廠等，均齊頭並進地正在從事擴大工程。前述的國後、擇捉兩島上進行的軍事基地建設，似應視為蘇聯一連串地擴大並加強遠東軍事基地網的一環^⑦。與此同時，蘇聯並已增強在數年前仍被認為其四個艦隊中最弱的太平洋艦隊。該艦隊現在是僅次於以莫曼斯克為基地的北方艦隊而成為第二大艦隊^⑧。

蘇聯如此加強遠東基地網，究竟表示什麼呢？第一，在遠東海域出現了能裝載SS—N18型遠程飛彈的大型三角洲型潛艇，這顯示沿海邊區以至堪察加半島的蘇聯遠東軍事基地網逐漸增強而成為對美戰略核子攻擊據點的一環。第二，裝設移動式多彈頭的SS—20最新型中程飛彈（射程六千公里）及有核子彈頭裝備的AS—16型空對地飛彈（裝載於TU—16型轟炸機），表示蘇聯遠東軍已正式步入核子武裝化的階段。同時，顯而易見的是以中國大陸和日本為攻擊目標，並顯示蘇聯在遠東也正在裝備與歐洲類似的現代化武器。第三，蘇聯太平洋艦隊本來在戰爭發生時，有被敵方封鎖在由對島、津輕、宗谷各海峽以至千島列島形成的自然防線內的弱點，蘇聯整頓軍事基地是為了打破這一弱點，並似準備在有必要時考慮包括使用核子武器的強硬對策。

今後，蘇聯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戰略發展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及柬埔寨建設海空軍基地的動向。跨在日本海以至印度洋的廣大水域活動的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最大弱點是，在這中間地區尚無可匹敵於像美國第七艦隊的菲律賓基地那樣的海軍基地。反言之，蘇聯如能在中南半島取得海空軍基地，那麼它在遠東的海軍威力必然會突飛猛進。蘇越條約是否使蘇聯取得金蘭灣及峴港基地等之使用權和建設權，目前尚不明。不過，從地緣政治學的觀點而言，這些權利的取得為蘇聯夢寐以求的最高目標，乃是毫無疑問的。因此，我們需要密切加以注意。

四 如何制止戰爭

像前述的蘇聯遠東軍力的增強，將對該地區各國的安全會有多大的威脅呢？第一，我們先要注意，日本已逐漸身受蘇聯的直接軍事包圍的威脅。而且，由於蘇聯已經把多種的大量核子武器逐步佈置在該地區，使日本今後不可避免，並且需要迅速地研訂對蘇聯核子突襲的防衛對策。日本的相對措施，在目前只有設法取得美國核子支援的明確保證，並促進民間防衛計劃的組織化。第二，在日本海的蘇聯海軍的增強，不但直接威脅了日本的安全，並且使韓國的國防計劃更加複雜。如果美國第七艦隊對這方

註⑦ 參照 Russel Spur, "The Soviets Send Two Gunboats" 一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FEER 雜誌）。

註⑧ 參照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英文朝日晚報（Times Foley (Reuters), "Soviets Said Modernizing Air Forces in the Far East" 一文）。

面的協防能力有限，那麼最後只有增強日本的海空自衛隊，而由日本在東北亞地區擔任更積極的防衛責任。如此的話，美、日、韓三國間的協商和協防關係就需要加以組織化。

第三，日本、韓國、中華民國的經濟活動，均需要依靠來自波斯灣沿岸的石油。因此，三者對於威脅該運油航線的蘇聯海軍之動向，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尤其如果蘇聯海軍能利用金蘭灣作基地的話，其威脅性會無比增加。爲了針對這種共同的安全上的威脅，日、韓、華是否能組織某種形式的協防關係呢？針對日中（共）條約簽訂及美中（共）建交後的複雜的東北亞政治情勢，這一點是需要認真檢討的。

第四，爲了檢討整個東北亞今後的安全問題，對中共政權將擔任何種角色的問題，希望日本、韓國、中華民國，以及東協各國應有共同的認識。依照美國中央情報局最近的估計，蘇聯在過去十年之內把總兵力由三百七十九萬增加到四百二十萬人，而其所增加約五十萬兵力的半數是用作增強中蘇邊界駐軍的。結果，現在派駐在中蘇邊界的蘇聯兵力有六十五萬人（增加了二十五萬人），而已經超過了駐留東歐的五十九萬人（增加了七萬人）^⑨。另據美國國防部長一九八〇會計年度的年度報告（一九七九年一月），蘇聯的地面部隊和戰術空軍的二十五%常駐於中蘇邊界地區。換言之，中共在蘇聯的全球軍事威脅中，單獨吸住了這麼龐大的蘇聯兵力。

無怪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各國，在暗中對中共的「同盟價值」估計很高。日、韓兩國的國防政策亦不能忽視這一嚴肅的事實。相反地，如果美國再繼續從東亞及西太平洋撤退兵力，或因日本怠慢於加強國防的努力，致使中共在國際間變成孤立時，中共說不定爲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向蘇聯謀求和解。這樣的話，東亞的所有非共國家可能要面對最不利之局面。

日本簽訂日中（共）條約後，即標榜「全方向外交」，以避免被中共捲入反蘇戰略的環節中。這種爲避免刺激蘇聯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或有一些效果。不過，我們不妨假想蘇聯有意侵略日本列島時的可能情況。那個時候，如果中共軍隊有很大可能向蘇聯邊界採取行動時，蘇聯或許會打消侵略日本的念頭。不然的話，如果中共採取旁觀態度而使蘇聯侵略日本得逞的時候，中共在遠東會變成孤立，不能不與壓倒性的蘇聯大軍相對峙。日本與中共建立正式同盟關係是不可思議的問題，不過，日中（共）條約似可認爲已在暗中把上述雙方共同利害關係明文化起來。今後似仍有必要，不給蘇聯採取決定性行動的口實之內，儘可讓它去摸索日本與中共或日、美、中共之間有何種承諾關係。

八十年代的東北亞之最大危機，是中（共）蘇戰爭的爆發。中共的戰略是，積極推動「四個現代化」計劃，以期在本世紀末以前能够培養足以對抗蘇聯的經濟力量和軍備。因爲這是要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的戰略，所以中共不可能先向蘇聯挑起戰爭。就

註⑨ 美國參眾兩院聯席委員會的「有關行政優先與節約問題委員會」（由普羅克麥亞任召集人）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公布的秘密聽證會議記錄中的美國中央情報局透納局長的證言。

蘇聯方面而言，如果無限期地維持像目前在邊界的對峙狀態，就等於上了北平戰略之當。同時，長期部署六十五萬的現代化軍隊在中蘇邊界所需要的盧布的消耗，再鑑於八十年代可能趨於深刻化的經濟停滯，對蘇聯來說，這將是很難忍受的重擔。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向中共發動包括核子武器的攻擊之可能性是可以設想的。那個時候的蘇聯軍隊的政治目標，可能不在全面佔領中國大陸，而旨在破壞新疆的核子基地和華北及東北的軍事基地和工業中樞，以期把中共的現代化計劃拖延十至二十年。還有一種假想是，蘇聯可能佔領整個東北，並支援北韓一舉制壓朝鮮走廊，同時攻佔北海道迫使日本投降，而把日本列島變為蘇聯稱霸世界的現代化兵器大生產基地。這個時候，越南亦有可能與蘇聯相互呼應而侵略陸路相連的東協國家。這是一種遠東大戰的假想。

不過，無論那一種場合，似非十億中國人所能忍受的，蘇聯必將陷入長期游擊戰（超級「越戰」）的困擾，致使消耗其國力，終將失掉與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勢力均衡，並有可能引起東歐各國及蘇聯內部少數異民族向莫斯科鬧獨立的連鎖反應，最後說不定會導致蘇維埃聯邦的崩潰。

總而言之，到底對中共發動先制攻擊較對，或繼續維持中蘇邊界的對峙狀態較好，蘇聯有其左右為難的矛盾。不過，過去納粹德國也是騎虎難下之餘，挑起了在理智上不應該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在共產主義理論方面已喪失了其吸引力，而在經濟力量方面亦將近會被日本和歐洲共同市場趕上。事實上已經變成所謂「有黏土腳的帝國」了。到了八十年代，其經濟停滯可能更為嚴重，另一方面其核子武力和傳統軍備可能達到最高峯。因此，擁有以「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為名的擴張主義意識之蘇聯，在不久將來可能被迫作「現在！或永遠放棄」的最後選擇。那就要面臨遠東戰爭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了。

因為如此，八十年代的西方同盟國家（美、日、歐洲各國）最關心的，當是如何制止蘇聯挑起大戰並封鎖其軍事擴張主義的問題。為此，日本乃至東亞各國就不能不適當地加強軍備。尤其是，有一兆美金GNP的日本，是否能更緊密地與美國合作並承擔組織地域安定力量的角色，將是八十年代亞太地區能否維持和平和繁榮的關鍵性問題。開頭時已經說過，日本、美國及亞洲非共國家的野心，有運用經濟力量來促進地區的政治安定和繁榮的建設性王牌。不過，如果這些角色無法封鎖破壞性的斯巴達式軍事國家的野心的話，這張王牌恐怕就會失掉其價值。

美國、中共建交與東亞的安全保障

川島弘三

——環繞臺灣海峽的戰略情勢

一、中南半島局勢的突變

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與中共當局突然宣佈今（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關係。由於此事在正式宣佈前一刻始通知日本政府，可見這次美國與中共建交相當唐突。

美國與中共建交的主要目的，從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明列「反霸權條款」觀察，毫無疑問的係基於對蘇戰略上的考慮。然而，這種考慮，從一九七二年美國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以來，業已存在。雖然如此，但由於其間存有若干困難問題，所以在當時遲遲無法建立邦交。至於這次突然建立了邦交，除了基於上述的考慮外，顯示了有更加現實的問題存在。換句話說，雙方的建交，意味着過去存在的困難問題都已經獲得解決，或者是把它等閒視之暫時擱置了。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所謂「現實問題」究竟是指什麼？在此，除了確切分析此一時期的國際情勢之外，別無其他適當方法。

中南半島的情勢，到去年十二月已有了激烈變化。十二月三日高棉在越南援助下成立了「高棉救國民族聯合陣線」（主席薩姆林）。從此時起，越南與高棉的糾紛，再不限於「鸚鵡嘴」地區，突然擴大了範圍。這種攻勢的提高，無疑是出諸越南的主動。越南機械化正規軍部隊即開始向沿湄公河要衝的柯拉欽、湛磅進攻。

越南軍及由越南支援的「救國民族聯合陣線」的戰略意圖，首先在控制湄公河以東的高棉地區。越南軍對高棉的攻勢，分北部、南部、中央三路向上丁、材楨、桔井、茶膠等四州積極挺進。其攻勢是從去年十月下旬，趁中南半島地區乾燥期（十一月到五月）開始的。當越南方面開始進攻高棉時，積極採取了各種外交和軍事措施。十一月三日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在該條約第六條中規定：「任何一方受到攻擊或攻擊威脅時，立刻協議，以便為消除威脅採取有效措施」。即一旦有事，雙方即開始協議，採取行動。

當前項條約簽訂時，越南方面曾派遣一個由黎筭總書記率領的龐大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在代表團中，尚有巴欽治人民軍總參謀長在內，蘇聯國防部長威斯基諾夫亦曾在莫斯科參加「蘇越會談」。

在簽訂「蘇越合作條約」同時，雙方又締結了六個經濟協定；其中包括了提供建築「河內——海防」、「河內——胡志明市」間的鐵路加強工程，紅河坦龍橋修建工程等援助。這些工程，無疑是意味着蘇聯爲了加強越南、高棉地區或泰國東北部的戰略路線而建築的。

在海防港方面，從米格二十三型戰鬥機到戰車、大砲及各種飛彈，不斷由蘇聯運到。從蘇聯來的軍事援助，正進一步加強，而且持續不斷。

蘇聯基於越南情勢，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曾召開華沙公約組織首腦會議，會中雖曾發生羅馬尼亞反對的風波，但在援助越南的問題上，却成功地達成了共同意見和採取共同行動的決議。羅馬尼亞採取反對態度的背景，雖然是受美國與中共授意，但其行動仍有限度，極爲明顯。

蘇越條約締結後，北平即已瞭解河內當局的意圖；十二月三日北平廣播，列舉去年八月十五日越南黨中央所發通告、黎笥在第九軍區（高棉鄰接區）的談話及南部地區人民軍首腦的活動等事實，指出越南有大規模侵犯高棉的企圖。因中共的危機感已到達頂點，故立刻派汪東興副主席爲團長，率領一個龐大代表團訪問高棉。

中共黨政代表團此次訪問高棉（十一月五日），係出發後始行發表，顯見當時的慌亂情形；而且中共又未與高棉簽訂友好條約，僅僅表示將對高棉提供物資援助。事實上等於北平放棄了高棉，從而說明了軍事情勢的嚴重性，以及中共由此而感受的危機之深刻。由於蘇越條約中特別規定了「有事協議」條款及在軍事平衡上，越南對高棉有壓倒性優勢，使中共的行動，遭受到極大的抑制。

此外，如果上述情勢繼續發展，不但高棉會遭到淪亡，中共的威信，勢將低落到嚴重程度。再由於越南勢力的擴張，並將出現蘇越兩國對中共的南北包圍形勢。中共在此狀況下所能採取的措施，除了設法救出施亞努，加強高棉反越統一戰線外，別無他途可循。中共並命訪問團團員羅青長，負責說服波布政權。

羅青長原爲中共中央社會部第一室主任（負責對外諜報工作）、國務院副秘書長，一九六五年曾隨周恩來兩度訪問施亞努時代的高棉；目前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或中央調查部長）。

在鄧小平方面，從其心腹胡耀邦（相當於代表團秘書長）處獲得詳細報告，並採取了各項對內對外的必要措施，如去年十一月對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的一連串措施，將其實權由鄧派的胡耀邦、傅崇碧、秦基偉等人接替。同時發動「大字報運動」，以封鎖華汪派的反攻氣勢。

鄧小平鞏固了國內態勢後，十二月四日突然對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伍考克，表示接受去年十月以來美方要求早日建交的建議，同意從事認真的會談。卡特總統從中共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柴澤民處獲得證實後，雙方即開始談判。

蘇越條約締結結果，在蘇聯威脅下，中共已陷於動彈不得的逆境。爲了打開此項局面，只有與美國建立邦交一途。據美國某高級官員表示：「中共方面對正常化運動非常熱心，但美國一直考慮到對蘇聯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影響」（見十二月十七日「朝日新聞」報導）。伍考克在建交談判的報告中也說：「鄧小平副主席曾參加了四次談判，最後協議在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之間舉行。其中十三日的談判是最高潮。鄧小平的參加談判，實爲談判能順利進展及成功的最大原因」（見十二月十八日「朝日新聞」）。

正在耶路撒冷進行中東和平談判的美國國務卿范錫，於十五日突然奉召回返華盛頓，顯示美國與中共建交，是在慌亂的急轉直下的情況中所決定。而且逼使美國作出決定的是中共，尤其是鄧小平的壓力，亦毫無疑問。

觀察美國與中共建交的效果，中共顯然企圖爲越南提供重新考慮其行動的機會，或可能避免金邊失陷；同時，中共將軍隊集中到中越邊境，來壓迫和牽制越南并藉此迫使蘇聯不致於立即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一九六九年發生的事件，證明了美國與中共的聯合，對蘇聯能發生某些抑止效果。今後，在聯合國及其他外交場合，或許會逐步出現北平與華盛頓聯合的效果。總而言之，中共最大的目的，可以說是企圖消除因最具現實意義的「蘇越條約」之簽訂而形成的來自南北之軍事威脅。

十二月十六日華國鋒在記者會上的發言，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都強調中共與美國建交，旨在反對「大霸權主義」和「小霸權主義」。也就是說反對「全球性的霸權主義」和「地域性霸權主義」，從而明確地顯示了此次中共與美國建交的意圖所在。

二、不同意而同意的「臺灣問題」

美國與中共一直無法建交的最大原因，無疑是爲了「臺灣問題」，乃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在美國與中共談判中，中共提出了「臺灣問題」的三個條件，即：（一）美國與中華民國必須斷絕外交關係；（二）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美軍撤出臺灣及臺灣海峽。卡特政府基本上對以上三條件有接受意向。但是實際上無法進展的原因，係由於美國要中共在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對臺灣安全保障，用某種方式對美國表明對臺灣不會行使武力；但中共方面則以「臺灣問題」爲「內政問題」，拒絕了美國的要求所致。

雖然「不行使武力」是美國與中共建交的關鍵問題，但在去年十二月雙方開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時，鄧小平對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國會議員曾表示過，對解決「臺灣問題」將不使用武力。鄧小平這種態度的轉變，可說是去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五日美國與中共談判能夠獲致協議的重要因素。中共決定改變從來態度，極明顯的是由於中南半島情勢激烈變化所致。

不過，中共方面，並未明確「保證」對臺灣不行使武力，僅是一種「暗示」而已。由於中共方面同意美國與中華民國維持「實務關係」，美國方面則基於中共「不行使武力」的「示意」，而將防衛性武器出售問題包括在與中華民國之「實務關係」之內。對此，中共方面在十二月十三日突然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

的確，就美國方面言，在雙方談判即將獲得協議前一刻，遭此情況，幾乎陷於無計可施狀態，而中共却步步進迫；在此情勢下，關於對中華民國輸出武器問題，只好在中共無明確承諾的情況下，達成了雙方「關係正常化」。正如外交評論家角田順所說：「美國被迫把王牌全部打出，而對中共最後一張牌則已無法應付了。」

總之，關於此一問題，在中共方面雖然並未給予同意，但對於美國單方面表明對中華民國將繼續輸出武器一節也未表示異議的情況下完成了最後協議。易言之，是一種「不同意的同意」。結果，關於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問題，則把它「擱置」下來。這和日本與中共間對「釣魚台列島問題」的處理，幾乎相同。

在美國方面認為：即使對此未獲得協議，事實上中共在今後五年內，絕無以武力進攻臺灣的軍事能力。（見日本「朝日新聞」十二月八日載美國國防部某高級官員的談話）不過這是美國方面的判斷，而其期間則僅有五年，並非一項長期展望。

就美國而言，在其聲明中，僅止於單方面希望臺灣問題以和平方法解決，並且期望在五年內透過和平談判予以解決。

在中共方面，爲了應付中南半島的現實情勢，短期內希望同臺灣能緩和緊張情勢；但對臺灣不行使武力，已如上述，並未對美國作任何承諾。中共依然堅持其原則，並保持其自由行動之權利。

鄧小平在去年九月六日對日本新聞界訪問團表示說：「究竟用何種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乃是中國內政問題，誰都無法干涉。」又說：「對臺灣現況表示理解，將以適當方法處理」。這裏清楚地說明了中共方面的意圖。

易言之，由於爲應付中南半島的情勢，中共雖然採取了短暫的緩和措施，但是它決不表示中共領導階層已放棄將來以武力進攻臺灣的意圖。雖然如此，中共方面還在這種情況下，爲着儘可能地促使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響應對北平「和解」，能採取若干現實的緩和措施。但臺北方面對此已加以斷然拒絕，並明白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決不與共產國家交往，更不會與中共談判」。

以武力進攻臺灣的意圖，在中共軍方領導階層中特別強烈，尤其在中南半島情勢發生重大變化前夕，表現得更是如此。例如去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副總參謀長伍修權，接見日本軍事人員訪問團時，曾明白表示說：「爲了『解放臺灣』，必須加強軍事上的準備。實際上，要通過臺灣海峽運送部隊，到目前爲止，其準備尙未完成。目前，致力於掌握制空權與制海權，並正從事陸軍的登陸作戰訓練。爲了『解放臺灣』，雖然有軍事準備與國際情勢兩項因素，但不使用武力，實無法『解放』。所以在充分準備與有利的國際環境下，一定要達成上項任務。」

所謂「有利的國際環境」，自然也包括了「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在內。一方面，「對越」、「對蘇」緊張關係的存在，不能不說依然還沒有達到「有利的國際環境」的狀況。因此，在今後五年以內，要創造這些「有利的國際環境」，將是中共的一個目標。

在軍事準備方面，中共已申言要確保制空權與制海權及訓練陸軍登陸作戰。特別是負有確保制海權的重要任務之海軍動向，值得注目。中共海軍，近年來非常積極的主張進攻臺灣。如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曾刊載了中共「海軍理論組」的一篇論文，指出：「建設強大海軍，是有關鞏固海防，以及解放臺灣和敵人佔領的島嶼等國家安全防衛上的重大問題」。這裏已說明了中共海軍建設的目的。同時，也暗示了海軍主要任務的優先順序為：「解放臺灣」、「對美防禦」、「對蘇防禦」及「支援民族解放鬥爭」。

海軍領導人，海軍黨委第一書記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蘇振華（據報蘇某已於今年二月七日因心臟病死亡），係鄧小平所領導的一九二九年廣西百色暴動起家的舊紅七軍出身，第二次大戰後的「國共內戰」中，曾指揮二野第十六、十七、十八等三個軍約十餘萬人，擔任揚子江渡江作戰。而且在一九五四年還指揮中共海軍登陸一江山和大陳島。

從陸軍「登陸作戰訓練」方面看，由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總後勤部長張震等人事佈置，值得注意。張愛萍是「國共內戰」時，擔任鄧小平領導的淮海戰役中的主力，其後又率領三野第七兵團渡過揚子江，在杭州沿海一帶出沒；並在指揮舟山羣島攻略戰中，先後登陸佔領了大樹山、金塘山島等地。從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到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期間，曾先後佔領過嵎泗列島、北甌山列島及沿岸各地。張震在參加淮海戰役中擔任參謀工作後，以第三野戰軍參謀長地位，擔任渡揚子江作戰的總指揮。到一九五〇年專負責兩棲作戰（登陸作戰）部隊的編訓工作，作進攻臺灣的準備，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方告中止。

蘇振華、張愛萍、張震等人事部署，顯示了鄧小平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領導階層之企圖。特別是從兩棲作戰的軍需動員觀點看，張震的出任總後勤部長，由其過去的經歷，頗值得注目。

現在的兩棲作戰，已非當年中共軍所使用的漁船、機帆船時代，而必須使用新型「LPD」進擊艇、「LSD」新型登陸艇及「LKA」兩用運輸艇等進步的登陸艦艇，而且更進一步的邁入使用直昇機和能裝載 V/STOL 的數萬噸級之「LHA」的時代了。易言之，必須擁有襲擊海岸背後空降部隊和配合海上機動的海岸登陸兵力從事聯合作戰之能力。

目前中共海軍僅有中型登陸艇十四艘、步兵登陸用艦艇十五艘、「LST」戰車登陸艇十五艘（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出版的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所載資料），而且均屬小型與舊式的。尚未具備有效兩棲作戰的態勢。

在中華民國海軍方面，擁有比較現代化的登陸艇為五十一艘（「LSD」二艘、登陸指揮艦一艘、「LST」二十二艘、中型戰車登陸艇四艘、多用途登陸艇二十二艘），故較佔優勢而且強大。同時臺灣海峽的制海權與制空權，都在中華民國政府掌握

之中。因此，在目前中共軍的進攻臺灣是不可能的。美國國防部方面所稱臺灣安全在五年內毫無問題，並非指中共企圖而言，而是就其實際能力而言。可是，既然中共有此企圖，就不應僅從其現有軍事能力來作判斷。如果中共購買英國「獵犬兔式」戰鬥機，它的「V-STOL」、「低空戰鬥」、「對地攻擊」能力，較美國「F-104天鷹式」飛機為優，並可用於強行登陸。因此，對中共國防現代化的未來動向，有加以注意的必要。特別是要從中共軍事領導階層的主張、論調及人事部署上加以考量，充分注視中共今後對臺灣的侵略企圖，此事極為重要。

三、臺灣海峽的戰略問題

本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告臺灣同胞書」，對臺北呼籲進行「和平談判」，並命令「人民解放軍」停止砲擊金門一事，顯示藉談判來解除臺灣海峽軍事對峙之意。

實際上，由於中南半島情勢發生變化的結果，中共在軍事上已喪失了進攻臺灣海峽的兵力。因為廣州軍區的第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五軍已逐漸向廣西省集中；昆明軍區的第十一、十四軍也同樣向越南邊境增加軍事壓力。在金邊陷落（一月八日）前夕，美國國防部方面雖然透露了中（共）越邊境「人民解放軍」集結大軍的情報，但這不過是美國與中共聯合起來的對越牽制措施。事實上，當時該地區附近的兵力同原有兵力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今後，中共駐在成都軍區的戰略預備軍第五十、十三軍及武漢軍區的第一軍等是否向南方移動，頗值注意。因為這是可以作為測知中共決心的指標。

不過中共步兵主力軍的部署狀況，在對蘇戰略上，其重點仍置於中國北方，至今並沒有任何變化。這次中南半島情勢轉為緊張的結果，中（共）蘇邊境地區的緊張情勢，亦再度升高。某些情報顯示，部署在臺灣海峽正面的福州軍區及福建前線部隊的第三十一、二十九軍，不是移向南方而是轉向北方的。就中共而論，最擔心的是兵力薄弱的新疆、蘭州軍區等西北地區。不過無論怎樣，目前臺灣海峽正面中共兵力，很明顯的已出現了一些真空狀態。停止砲擊金門，實際上就是證明。也許部署在金門島正面的中共軍第三十一軍重裝備砲兵部隊，除了留駐一部分外，可能已陸續向軍區以外地區轉移。

中共對臺灣要求解除軍事對峙，除有「政治攻勢」（統一戰線工作）意義外，在軍事上實有其實際需要。所以，美國國防部方面才表示「中共方面無解放臺灣能力」，甚至在此數年內連「解放企圖」也不存在。不過，在臺灣海峽出現中共力量的某些「真空」狀態，對中華民國安全性固然有所增高，但另一方面，意味着蘇聯軍事力滲透的危險性亦隨之增加。

蘇聯太平洋艦隊，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定期在其海參崴基地與印度洋之間巡弋。近年來，該艦隊的「作戰線」，已採取自日本海、東海，通過臺灣海峽入南海到印度洋的路線，其「退却線」也大多採取上述相反路線。關於蘇聯艦隊通過臺灣海峽之事，

上述中共「海軍理論組」論文亦曾指出其事實；中南半島緊張情勢升高後，蘇聯艦隊通過臺灣海峽情況，亦愈見頻繁。目前在東京灣、西沙羣島附近海域，已有蘇聯艦隊集結，而這些艦隊，可以想見也是通過航程最短的臺灣海峽。

一方面由於蘇聯軍事力量在此附近海域逐漸增強，另一方面，中共軍又自海峽方面陸續撤退，使此區域的軍事平衡發生崩潰。同時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弋，已由「經常」改為「隨時」，顯見已不若過去對此區域具有影響力。

此次美國與中共建交時美方聲明中僅謂：「美國聲明將於四個月以內將留華軍事人員自臺灣撤離」；而對「臺灣海峽」未置一詞。因此，從美國方面看，基於上述情勢，判斷美國已表明了仍有維持在臺灣海峽影響的意圖。中共對此，並未表示異議，由此可見雙方對此問題可能暗地裏有所諒解。

在美國的戰略考慮上，如上面所述，第七艦隊並沒有太多的力量用於臺灣海峽，因此，有意依賴中華民國軍事力來填補其不足之處。所以美國在未獲得中共同意之情況下，表示將繼續對臺灣輸出武器的意向，不僅是意味着防止中共對臺灣的侵略，更重要的是一項爲了對蘇聯在這方面擴大影響力的警戒措施。換句話說，美國的戰略構想是：中共負擔對蘇、對越邊境方面的責任，臺灣海峽則由美國與中華民國共同防衛。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園田外相在國會答詢中，曾表示臺灣地區已自日美安保條約「遠東範圍」中除去；次（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正式聲明表示，即使對臺灣武力進攻可能性極微，惟對臺灣地區從日美安保條約「遠東範圍」中排除乙節，則隻字不提，顯示美國未贊同園田發言。此點不能不視爲美國仍重視臺灣海峽戰略情勢的變化。

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後派遣以副國務卿克里里斯多福爲團長的美國代表團到臺北時，團員中包括了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威斯納和國防部長阿瑪可斯德，亦頗值得特別注意。

美國國防部對於臺灣，不僅繼續提供已簽約的軍用物資，而且還聲明在一九八〇年以後，「只要有必要，將繼續提供防衛武器」。美國業已決定供給臺灣的武器中，包括了「F5E」幽靈式戰鬥機、「小牛TV」導向飛彈、雷射誘導靈敏炸彈等。「F5E」戰鬥機較中共空軍擁有數量不多的新型機「瀋陽F-9」或「F-8」（米格二十一型）之性能爲高。如果中共方面想發展性能較高的「F-12」，美國必將考慮供給在一九七七年決定停止供應的「F-16」及一九七八年決定停止供應的「F-18」等最新銳的戰鬥機。

這些美國將爲中華民國繼續提供的武器中包括雷射炸彈和「小牛TV」飛彈等是引人注目的。因爲這兩種都是空對地的攻擊武器，同時也勢必增加對艦艇的攻擊能力。另加「F5E」戰鬥機，故在此數年內，中華民國所確保的臺灣海峽的制海權和制空權，當會更加鞏固。

由於臺灣海峽的制空權與制海權掌握在中華民國之手，使中共方面的戰略態勢，近年來已漸漸遭受極大影響。自從中南半島

情勢轉緊以來，中共海軍的艦艇，已陸續向海南島的榆林港集結。但這些艦艇，都是從廣州軍區沿岸的黃埔、汕頭、湛江等地移駐來的「南海艦隊」所屬艦艇。

中共海軍分三個艦隊，即管轄渤海與黃海的「北海艦隊」、管轄東海的「東海艦隊」及管轄南海、東京灣的「南海艦隊」。因為臺灣海峽的制海權掌握在中華民國手裏，而且中華民國海軍又保有優勢兵力，所以上海的東海艦隊與湛江的南海艦隊，完全無法實施聯合作戰，從而不能發揮其綜合戰力。即使在中共海軍中擁有最優勢兵力的東海艦隊，其在臺灣海峽的福州沿岸海域的活動，幾乎也完全被封住。

中共海軍具有上述海軍戰略上的重大弱點，而在東京灣方面集結的蘇聯艦隊之兵力又是陸續地增加中。蘇聯艦艇所裝備的主要海軍武器有「SS-N-9」、「SS-N-10」、「SS-N-11」等最新式艦對艦飛彈，中共的舊式「SS-N-2」[「斯的克斯」飛彈（一九六〇年式），已陷於無法對抗狀態。而且蘇聯已有將這些優秀裝備供給越南海軍的傾向。所以中共海軍所受威脅，正日見增大。如果蘇聯海軍在越南的金蘭灣構築基地，則此方面的海軍的勢力平衡，將遭到決定性的崩潰。

中共目前最期望的戰略意圖是消除其海軍力量在臺灣海峽受隔斷的弱點。所以與臺灣解除軍事對峙狀態，在其海軍戰略上實有重要意義。中共認為：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狀況，事實上不得不期待中華民國海軍對蘇聯形成的壓力。

最近中華民國海軍已成功地生產了國產的艦對艦「雄蜂」飛彈。此種飛彈相當於以色列的「加百利」飛彈，較中共裝備的「斯的克斯」飛彈為優秀（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時，雙方裝備飛彈的哨戒艇在海戰中，以色列以「加百利」飛彈戰勝了阿拉伯方面的「斯的克斯」飛彈）。一般評論，其優劣係基於對抗ECM技術的差距所致。

今後，由於美國援助，中華民國海軍戰力，包括對潛艇作戰（ASW）能力在內，必將繼續提高，對於通過臺灣海峽駛往東臺灣的蘇聯艦隊，是一項無言壓力。在現狀下，蘇聯艦隊要通過臺灣海峽之前，必先通知中華民國後始行前往。目前，關於臺灣海峽的安全保障，事實上，中共完全依靠臺北與華盛頓兩方面。因為中華民國聲明決不與「共產主義」（包括蘇聯）妥協，華盛頓固然安心，也為中共帶來了某些安心感。

雖然華盛頓今後將繼續對中華民國實施軍事援助，但是中華民國對中共的國防現代化（即擴張軍備）的警惕，並無放鬆，亦未放棄對中共陸海空軍的對抗態勢。所以，今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動向，以及掌握臺灣海峽的中華民國國軍的軍事戰力，才是對東亞安全保障產生巨大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臺灣海峽、巴士海峽是日本的重要海上交通線（SLOC），因此日本不能不寄予重大關心。

四、美國的國防戰略與東亞

根據倫敦戰略研究所出版的 *Military Balance 1978-79* 所載：歐洲北部及中部陸上戰鬥部隊兵力，「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十個師，計六十二萬六千人；華沙公約組織軍共三十二個師，計九十四萬三千人；裝備方面，雙方所擁有戰車，「NATO」七千輛，華沙公約組織二萬一千輛，顯示在軍事力量對比上，華沙公約組織比「NATO」，佔有約三倍的優勢。

過去美軍駐歐兵力四十三萬四千人，現在已減至三十萬人，而蘇聯駐東歐兵力，却由二十六個師增加到三十一個師（蘇聯在中蘇邊境增加二十五個師同時，在東歐增強兵力）。原來「NATO」是比較為優秀的武器，來對抗華沙公約組織的較多兵力的，可是最近由於華沙公約組織致力於武器現代化的結果，促使在全盤軍事力量對比上，西方逐漸趨於不利方面。

為此，一九七八年五月的「NATO」最高階層會議中，在長期防衛計劃（LTD P）方面，特別強調加強美國、英國、加拿大的戰略預備軍之迅速增援態勢的重要性，並認為能夠迅速動員、移轉戰鬥部署的強大而且裝備精良的預備軍，足以抵消上述不均衡狀況。同時，決定：希望美國能擁有在十天內派遣地面部隊十個師和戰鬥空軍六十個隊的能力。

美國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歐洲軍事力的平衡上面，例如美國國防部本年初所提出的年度報告（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中，明確表示美國和西歐各國最優先關心的軍事情勢是東歐與蘇聯本部的西部管轄區。根據去年初「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勃朗，為了對抗蘇聯在歐洲的閃電攻擊，已秘密完成一項「美軍重編五年計劃」（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四年）指示，並且已送交美軍領導人。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美國「時代週刊」刊載有關海軍論文中也透露了與上項秘密指示同樣的消息。該刊指出，曾負責編製「關於國防部長一九八〇年會計年度預算綜合指導綱要草案」的國防部助理次長拉賽·姆萊曾表示：「我們的短期目標是使 NATO 遭到蘇聯閃電作戰最初數週內不致敗退。我們願意為此項目的投注我們所擁有的物質力量」。

基於為應付歐洲的全面戰爭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中東，特別是波斯灣地區的小規模戰爭的「一又二分之一戰略」，美國把國防上的最高優先放在增強和支援 NATO 陸軍與空軍力量上面，致使其亞太地區的陸軍（不在話下）以及海、空軍，在國防上的優先序列，被列在最後面。駐韓美國地面部隊，將在一九八二年前撤竣，即是一項顯明事例。

不但如此，美國所擬定的國防政策方向，甚至造成了對整個海軍力量的輕視。例如對於 NATO，特別是在中部歐洲方面的與軍事平衡少有直接關係的海軍預算，已在一九七八年度會計預算中，被削減了四十七億美元之多。結果，雖然決定建造一艘三叉戟（Trident Submarines）原子潛艇、六艘護航用驅逐艦和五艘「梅納」遠航艦；但海軍當局所強烈希望建造的原子航空母艦，却未獲批准。根據一九七八年四月美國海軍大學研究組所提出的報告書，指出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是「兵力投入型」（CV A），大西洋艦隊是「制海型」（ASW）的。

因此，僅從一九七九年度海軍預算看，美國國防當局，爲了歐洲有事時增援兵力及保護通到波斯灣的海上交通線，採用了建設「ASW」型海軍的方針；而在亞洲則拒絕採用像以往運用其航空母艦的攻擊力對付朝鮮戰爭或越南戰爭等亞洲情勢激變的「CVA」型海軍建設方針。根據上述「時代週刊」論文引用某海軍高級人員談話，指出：「如果削減海軍基本戰力的航空母艦，使其總兵力減少到海軍所要求的水準以下，一旦到了戰時，只有放棄某些重要盟國。目前，在暗地裏傳說，日本、挪威、希臘、土耳其等將包括在被放棄之列」。今後對中歐側翼的挪威、希臘、土耳其或尚有重新被檢討的可能，而日本却不可否認地將被置於不重要地位了。

總之，儘管卡特總統本身是海軍出身，但就卡特政府現狀言，對海軍力量的作用，評價甚低。卡特政府的智囊集團布魯金斯研究所去年所提出的報告中，曾分析了現有軍事力量在和平時期使用的事例，他們對航空母艦機動艦隊之使用效果，表示懷疑。這與美國海軍一貫強調「基於平時政策上的要求使用海軍力量支持，能發揮非常有效的支援作用」的基本戰略思想，有不同的觀點。這裏充分表現了卡特政府對現狀的認識。布魯金斯研究所也主張要從琉球撤退美國駐軍。實際上，東北亞地區唯一能從事兩棲作戰部隊的琉球第三海軍陸戰師，已逐漸準備好改採「有事駐留」方式的態勢。雖然布魯金斯研究所等的說明，是依據美國與中共間緊張情勢已經緩和，在這方面留駐部隊「已無必要」等理論，但是日本防衛研修所桃井眞氏則指出係基於爲應付歐洲發生事端而在亞洲則事實已無能爲力的情況下，採取「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理論。顯然，這種理論勝過了海軍和駐韓美軍當局所主張的「仍有必要」的理論。

英國戰略研究所長巴特拉姆曾經說：「美國現在已不再願意犧牲自身利益，來爲世界共同利益採取行動，更採取了自動的不行動措施」。目前美國所維持的對外承諾的信賴度即使沒有問題，今後美國勢必會把過去所提出的承諾中認爲「過份」者，儘量加以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對美國的對外承諾之信賴度不能不認爲已有降低。

美國與中共建交時，美國單方面廢止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該條約效力尚有一年，但駐臺美軍將提前於今年四月底撤離。不過這並非對臺灣如此，也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全盤問題。除朝鮮半島外，包括琉球在內的日本，也不會例外。

美國的第七艦隊，依然在日本周圍海域內巡弋，顯示美國對條約承諾的信賴性，仍繼續存在。不過，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美國所關心的「美國利益」，已經不是日本周圍，而是準備一旦歐洲有事而引發中東紛爭時，可支援以「地牙哥·加西亞」爲基地的印度洋—東南亞與美國本土的戰略物資（石油、稀有金屬）補給路線的海上交通路（SLOC）。從最近美國海軍的活動狀況看，這一趨勢已逐漸明顯，加以由於日元升值及物價上漲，更逼使美軍逐漸由日本移轉到菲律賓。

由於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減少了一個對外條約承諾；相反的，蘇聯在最近却與越南、衣索比亞、阿富汗先後締結了

「友好條約」。目前蘇聯在亞洲、非洲方面所締結的條約，已激增到九個之多，這是無法忽視的現象。此外，蘇聯在日本北方國後、擇捉島陸續建築前進基地，更值得注目。

在此種趨勢中，如果美國在亞洲、太平洋方面再降低它的承諾，或者撤退前進配備，蘇聯乘其真空狀態，從事政治和軍事勢力的滲透，恐難避免。

就美國而言，彌補上項空隙的唯一方法，陸上則依靠中共，海、空則要依靠日本的軍事能力。所以最近美國特別強調中蘇邊境「人民解放軍」的對蘇聯牽制作用及強烈期望日本能提高「ASW」、「AAW」能力。上項主張的代表作之一，是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所發表的馬蓋爾·比羅斯貝利的一篇論文。

美國駐日大使曼斯斐德因為擔心日本微妙輿論受上項論調影響，乃逼使比羅斯貝利離開了美國參院預算委員會的工作崗位。其實這些論調不祇限於比羅斯貝利，最近美國方面的言論，似乎很多都是過分脫離現實的性急的期待論。

至於「人民解放軍」因根本上缺乏機動攻擊能力和戰術空軍力量，更由於缺乏後方補給支援能力和毫無對蘇攻擊能力等戰略弱點，幾乎無法評估「人民解放軍」的真正力量。因此，就蘇聯軍而言，任何時候，在必要時，只要留駐若干防守兵力，即有餘力將大部分兵力轉用到NATO西歐正面。美國似乎對這些事實視若無睹。事實上美國的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時，眼見落後的「人民解放軍」步兵部隊的現狀，均表示震驚。

由於美國與中共建交結果，造成了最近將達最後階段的美蘇「SALT」談判（限武談判）由蘇聯方面突然要求延期舉行，和越南軍在蘇聯支援下，攻陷了高棉首都金邊的事實。蘇聯這些行動，無非要試探中共實力程度，表示蘇聯決不害怕「中國牌」，至少也向美國表示它並不懼怕美國。

在日本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前，華盛頓當局曾經準備發表歡迎聲明，由於美國的如此熱烈支持，終於達成了締約目的；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也由於中南半島情勢的急變，中共在驚慌之餘，向美國提出談判要求，美國竟未充分考慮「臺灣問題」，立刻同意建立了外交關係。

今後美國如果長期在保持實力的情況下，要運用所謂「中國牌」或「日本牌」，則沒有什麼不對，也許可以認為這是「外交上的勝利」。但是，如上所述，美國已很明顯地計劃將軍力集中到歐洲。為此逐步要從亞洲、太平洋撤軍，並想利用中共和日本填補撤軍後的空白。假使美國這樣做，今後蘇聯對亞洲、中東、非洲、歐洲的攻勢，可以想見不會減弱，而會增強。不能不說是一項危險的現象。

目前阿拉伯半島或中部歐洲若干國家，已看透美國的軟弱，為謀求緩和來自蘇聯的威脅而接近蘇聯的傾向，漸見增高。所謂「芬蘭化」的主張，已逐漸成爲現實問題。

東南亞方面也不能例外，今後日本對美國、對蘇聯、對中共，也有採取更複雜微妙的對策的必要。日本雖然仍將堅持日美安保體制，但只依賴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美國戰略之日本對美外交，已不適當；同時，只顧經濟利益或「和平友好」的口號，而採取的對中共、對蘇聯外交的積極態度，也是非常危險的。日本現在已到了必須站在深切洞察東亞安全保障立場，以確立如何達到此區域內真正「和平」與「安定」為目標，建立日本獨立的大戰略，來發揮其領導權的時候了。

五、中國大陸的戰略情勢與華鄧政權

中國大陸周圍的戰略情勢，如果增加激動因素，當然中國大陸內部「人民解放軍」的動向，將成為重要關鍵。去（一九七八）年四月以來，中國大陸所發生激烈的「批判林彪、四人幫」運動，即是一項鄧小平掌握中共軍內部領導權的運動；尤其在廣州軍區、瀋陽軍區、蘭州軍區等三個軍區，實行得最為徹底。這些軍區都是舊林彪系（第四野戰軍）部隊駐屯的軍區，反鄧色彩特別濃厚，所以壓制這些軍區林系勢力，對擴大鄧小平權力，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其中最激烈的是廣州軍區，在鄧小平指揮下，該軍區主腦人物許世友、韋國清、習仲勳、向仲華、王淳等親自帶頭揭發和清查工作，一方面平反了文年生、郭成柱、陶漢龍、相煒、江民風等；另一方面則整肅了于厚德、黃榮海，以及惠陽、汕頭、佛山、韶關、湛江、肇慶等各軍分區的首長。

廣州軍區與昆明軍區，都是連接越南邊境的重要戰略性軍區；從去年四月起開始激化的中（共）越邊境糾紛及中共方面採取強硬態度，正反映了這些軍區內部緊張情勢向外發展的結果。但在另一方面，中共對越南反應如此強烈感到意外，所以廣州軍區的內部抗爭，自去年九月「一萬人平反大會」後已經停止。當然如果中（共）越糾紛進一步惡化，鄧小平為了整肅林彪系部隊，而命令這些部隊介入對越作戰，對鄧小平而言，決非不利。不過，他也絕不願意陷入蘇聯所企圖的南北夾擊的戰略中。

在連接中（共）蘇邊境的瀋陽軍區，反鄧派的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曾昭山，已遭整肅；同時內蒙軍區司令員尤太忠也遭更調。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因早已覺察到此種情勢，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軍區黨委會（去年十月）中，先自己表明了「以實事求是的原則處事」之態度，從而轉為支持鄧小平的立場，藉以保持原有的地位。在蘭州軍區，一方面強調「實事求是」的傳統，另一方面又肯定毛思想的「真理」，仍繼續堅持其中立態度。不過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第一政治委員蕭華，都是舊林彪系幹部，這是不能不注意的重要因素。

同蘭州軍區同樣的例子，在昆明、濟南、成都軍區可以看到。不過，福州軍區司令員楊成武、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北平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均保持沉默，惟言外之意，表示不滿。

上述現象，可說是鄧小平依然還沒有完全掌握地方軍事勢力。在此期間，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軍報」，突然宣佈，把林彪、「四人幫」批判運動，除保留少數單位繼續進行外，到年底即告結束。雖然此舉是爲了應付對外緊急情勢，但也不能否認是鄧小平「後退一步」的作法。

在對蘇、對越緊張聲中，爲了對「解放軍」部隊作戰略動員，要取得地方軍事領導人的合作，乃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十二月十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慶祝廣西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的社論。所奇怪的，是該自治區實際成立日期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而中共却指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鄧小平發動「廣西百色暴動」之日爲「廣西自治區」成立紀念日，並在南寧市舉行盛大的慶祝會。很顯明的是一種要把鄧小平塑造造成「創造紅軍的功臣」爲目的之行為，同時也表示北平對接連越南邊境的廣西自治區之重視和對越南的示威行動。北平方面還派了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顧問卓琳（鄧小平之妻）及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參加；韋國清在會中除了說明「廣西是中國南大門，戰略地位極重要」外，並強調對越南有警戒和備戰的必要性。同時在該次集會時，廣州軍區還派了以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歐致富爲首的一個廣州軍區代表團參加。這一事實，是廣州軍區的部隊逐漸向廣西自治區集中的具體佐證。

歐致富曾參加過鄧小平的「百色暴動」，其後成爲林彪四野第四十八軍指揮官並從事各項活動的軍事幹部。此一事例，說明了即使是林系幹部，在「安定團結」號召下，也非共同合作不可。

在鄧小平方面，首先不得不集中精力，以掌握北平周圍軍事組織之權力爲重點；從去年十一月至年底所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採取了停止北平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職務，並解除八三四一部隊司令員兼政委汪東興職務等措施。鄧小平所運用的軍事幹部，主要有楊勇、傅崇碧、吳烈、楊得中等人（楊勇爲八三四一部隊兼北平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爲北平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吳烈爲北平衛戍區政委；楊得中爲八三四一部隊政委，其中一部分尙未證實）。

楊勇係鄧小平廣西暴動時的「紅七軍」出身，國共戰爭時，參加第二野戰軍活動；與鄧小平之間，過去曾有一些關係。楊勇、傅崇碧曾參加「八路軍」華北游擊部隊——「晉察冀軍區」、「冀魯豫軍區」長期作戰；此後，這些部隊大部分併入「華北野戰軍」；後成爲朝鮮戰爭中的「中共志願軍」之核心部隊，可稱爲「志願軍——華北野戰軍系幹部」。朝鮮戰爭結束後，彼等幾乎都駐屯在華北、東北一帶，擔任該方面軍職。

鄧小平爲了控制北平，除了依靠其嫡系的「四方面軍——二野系軍幹部」以外，也有必要拉攏此等實力人物。

「志願軍——華北野戰軍系」的代表性幹部，當推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本（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武漢軍區司令員地位，已由王必成（前昆明軍區司令員）接替。至於楊得志，一般推測將被任命爲北平軍區司令員或八三四一部隊司令員，擔任北平周圍控制工作，或者派往昆明軍區，擔任對越南軍事行動的總指揮。如果楊得志派往昆明軍區，武漢軍區部隊勢將一

同調往昆明軍區。戰略預備軍集中於昆明，也顯示北平的重大決心。無論如何，在緊迫情勢下，調動昆明軍區司令員，乃反映了該方面軍事情勢，極爲慌亂。

海軍第一號實力幹部蘇振華，和楊勇一樣，也曾在「二野」從事活動，本來也是「志願軍——華北野戰軍系」的幹部。海軍對「臺灣問題」、「釣魚台列島問題」上主張強硬論，與鄧小平等主張，有微妙的不同。由於蘇振華的突然死亡，造成了海軍在緊張情勢下的空白狀態，同時也促使鄧小平與海軍間的關係之困難逐漸加大。向北方或南方移動中的福建前線部隊司令員楊成武，也屬「志願軍——華北野戰軍系」，是該系內反鄧色彩最濃厚的人物，因此對其活動，決不能不加以注意。

鄧小平與軍部之間，有關對蘇、對越軍事行動，可能有不同意見，而如何調整此種不同意見，就成爲中共的重要課題了。在此種情況下，耿飴就任軍事最高決策機構——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秘書長職務，值得注目。

耿飴原是「志願軍——華北野戰軍系」的核心人物，是一個富有政治外交（兼任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長）頭腦的老幹部。在中共（越、中）蘇邊境緊張情勢逐漸尖銳化的狀況中，此輩擁有豐富的現代化戰爭經驗而且又掌握了部隊實力的「志願軍——華北野戰軍系」幹部的作用，勢將增大，其動向成爲今後極可注目的重要因素。

總之，在三中全會中，陳雲出任黨副主席、胡耀邦任黨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宋任窮爲黨中央組織部長、姚依林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等等，顯示鄧小平幾乎已掌握了黨內領導權；但在軍中，由於複雜的派系反抗及爲應付激烈變化的對外情勢，有建立全軍一致體制的必要。但實際上鄧小平依然無法有效掌握軍中領導權。

鄧小平推進的「四個現代化」，由於中國大陸仍留有阻礙現代化要素的存在，特別是「管理」制度的不完備，更由於基本上缺乏所需外匯，要實現現代化，甚爲困難。即使沒有上述困難，如果處理對越、對蘇問題有誤，鄧小平在軍中地位的不穩，也難免會迅速惡化，從而可能促使中國大陸出現從未有過的混亂局面。最近中共特別通令「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和「軍事訓練」，即充分表現了對軍內紀律問題的不安與對備戰的焦急狀況。

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樣，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中國大陸人民要求民主化的運動之高漲，被稱爲「四五運動」。它似乎告訴人們「新革命」和「動亂時代」的來臨。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從「大正」到「昭和」初期的中國大陸之動亂，曾破壞了東亞的和平與安定，日本也迅速地被捲入其漩渦中。因此，爲了確立東亞的安全保障，今後日本應該用透澈的眼光，冷靜的對付中國大陸的動向。